

過新年：

從傳統到現代臺灣節慶生活的交錯與嫁接

(1890-1945)

林玉茹*

摘 要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葉，臺灣由清朝統治轉為日本殖民地統治。政權的變動，特別是與此同時，持續學習西化的日本殖民地政府為鞏固其殖民統治，勢必對臺灣的傳統文化和生活產生巨大的規訓和影響。以過新年而言，臺灣人原來是過農曆新年，殖民政府卻引進具有現代化象徵的西曆新年；兩個新年，除了時間不同、交錯過節之外，儀式或活動也大有差別，甚至互相嫁接各類型的活動。臺灣人如何逐漸調整或適應這種節慶生活的規訓或轉變，是否有其特殊的對應策略，或反映另一種形態的殖民地抵抗精神，都是本文關心的重點。

本文即以臺灣人如何過新年為研究主題，主要利用清末至 1945 年之間臺灣人的日記、報紙及相關文獻，試圖討論清末到日治時期臺灣人節慶生活的演變，新、舊文化元素的交錯和嫁接，並探討其變或不變的背景與原因。

關鍵詞：新曆元旦、舊曆元旦、廢舊正、同化、文化抵抗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來稿日期：2013 年 3 月 20 日；通過刊登：2014 年 3 月 4 日。

- 一、前言
 - 二、舊曆元旦傳統的延續與變容（1890-1918）
 - 三、新曆元旦的引入與新、舊年節的競爭（1896-1918）
 - 四、兩度迎年：規訓與不完全同化（1919-1936）
 - 五、皇民化的抑制：臺灣人的抵抗和舊曆新年的隱形（1937-1945）
 - 六、結論
-

一、前言

節慶是臺灣人一年中重要的活動，相當能展現常民的生活規律、習慣、娛樂以及文化價值。從十七世紀至今，臺灣歷經荷西、鄭氏、清朝、日本以及中華民國政府的統治；每一次的政權更迭，由於不同文化元素的加入，也帶來節慶生活的「變容」。特別是從「殖民主義與文化變遷」的角度來看，為鞏固政權、宣示殖民統治的正當性，殖民者往往以優越者的姿態，試圖貶低被殖民者的生活形態，極力改造其生活規律或習慣。另一方面，我們也常發現，根著於常民生活的文化習慣和價值，往往不容易被輕易改動，而隱含無意識的文化抵抗的意味。在變與不變之間，究竟有哪些因素在作用？又顯現何種意義？

清末到日治時期，臺灣人的節慶生活中，最特殊的現象即為由一個舊曆新年演變成二個新年。換言之，舊曆新年（農曆新年）與新曆新年（西曆新年），舊與新之間，並非以歷時性（diachronically）的方式結合在一起，而是共時性地（synchronically）共同存在於同質的時間和空間中，且相互競爭。¹ 其次，從明清時代以來，新年、端午以及中秋已成為臺灣人一年中最重要的節日。² 其中，

¹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新版）》（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頁209。

² 楊聯陞，《國史探微》（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3），頁66、82。

新年為時最長，³ 且係一年中最長的假期，歲時禮俗活動最多，⁴ 在臺人的節慶生活中遂最具代表性。因此，本文選擇過新年作為研究主題。

1895年，日本統治臺灣之後，明治維新氛圍下的殖民地政府帶入象徵現代化的新曆概念，開始過新曆新年。從此，臺灣人的元旦逐漸區分出新曆元旦和舊曆元旦兩個節日；究竟該過新曆抑或舊曆元旦，更成為此後臺人生活上的難題之一。殖民政府和輿論推動新曆元旦的過程，充分展現了政治和文化控制的意圖。然而，選擇新曆或舊曆，是否即等同於維新者和守舊者之差別？不同地域、階層、身分及性別的臺灣人，對新曆新年的接受程度並不一致，其中除了文化習慣的固著性之外，是否也隱含被殖民者文化抵抗的精神？又，究竟哪些臺灣人支持和推動新曆新年？隨著日治時期時代環境的改變，臺人過新年的內容又有何變化？新曆和舊曆元旦如何並存，又如何產生競爭？以上均為本文試圖解析的問題。

從二次戰前至戰後以來，不少文章從民俗采風的角度，約略記錄臺灣人過傳統舊曆新年的狀況。1995年，宋光宇首度談到日治時期臺灣人過兩個新年的現象，並認為臺人是為了現代化而過新曆新年。⁵ 2007年，顏杏如又以「兩個正月」為題，從在臺日人和臺灣人兩種異質文化共振下殖民地社會狀態變化的角度，討論在臺日人的新年、臺灣人的新年以及兩者時間交錯所呈現之時間和空間的雙重性。他指出1910年後半以降，臺灣人對新曆新年的態度大為改變，迎接兩個新年的現象逐漸普及；改曆會、同風會、保甲以及學校教育則是推動臺人過新曆新年的主要助力。又由於部分日本人的節日與舊曆新年為同一天，而出現日本人、臺灣人、制度（國家）的時間交錯重疊以及文化轉變、混淆的現象。⁶ 2009年，顏杏如的博士論文則進一步處理戰時臺灣人的正月，從朝向一元化時間的觀點，概論殖民政府開始著手嚴禁舊正月和臺人如何「暗默的抵抗」。⁷

³ 從農曆十二月十六日的尾牙起，一直到正月十五元宵節止，為傳統過新年時間。這是因為傳統農業社會，各種設施不發達，需要較長的準備時間。參見王世慶，〈閩臺農曆過年的禮俗〉，《臺灣風物》17:5（1967年10月），頁37。

⁴ 毛一波，〈臺灣的新年〉，《臺灣風物》13:7（1964年2月），頁3。

⁵ 宋光宇，〈過新曆年？還是過舊曆年？：日據時代的「曆法改正」及其社會文化意義〉，《歷史月刊》85（1995年2月），頁41-47。

⁶ 舉例而言，如天常節偶爾會與舊曆新年同一天。參見顏杏如，〈二つの正月：殖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時間の重層と交錯（1895-1930年）〉，《日本台湾学会報》9（2007年5月），頁1-21。

⁷ 顏杏如，〈殖民地都市台北における日本人の生活文化：「空間」と「時間」における移植、変容〉（東京：日本東京大學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専攻博士論文，2009），頁314-320。

顏杏如已釐清日治時期臺灣人過兩個新年的現象，提出不少重要的觀察。然而，他主要以臺北地區為觀察重點；史料利用上，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主，日記則僅使用 2000-2004 年出版的《灌園先生日記》，較無法看出臺人究竟如何因應殖民政府的同化政策以及接受兩個新年的過程。不過，如同顏杏如已注意到，不同地域和社會階層對廢棄舊曆新年和實踐新曆新年的程度大為不同，在臺灣人當中也出現不同時間和生活步調的狀況。⁸ 透過近來出版的各種日記，當更能看出這樣的特徵。其次，他只關注元旦當天的活動，並未注意整個新年期間節慶內容的變化；臺人如何過兩個新年，其活動內容的演進仍有待完整地重現。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新曆和舊曆新年之間習俗的相互嫁接，究竟反映何種意義？再者，是否正如同顏杏如所言，1910 年代中期之後臺人過新曆新年已逐漸普遍化？

本文主要利用清代相關文獻、日治時期的報紙和日記，重建清末到日治時期臺灣人新年節慶活動的演變。所使用的日記，包括具漢學淵源、長期擔任地方保正的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1907-1936 年）、從公學校教師轉任蔡蓮舫西席（家庭教師）及經商的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1912-1926 年）、臺灣民族運動領袖林獻堂的《灌園先生日記》（1927-1946 年）以及曾到日本留學、擔任醫生的吳新榮《吳新榮日記》（1933-1947 年）。⁹ 他們四人正好代表不同成長經驗、地域及身分的臺灣人如何經歷兩個新年生活的過程。張麗俊從頭到尾均以舊曆為主、新曆為輔註記，並不記西元年代而採清朝皇帝年號（清朝結束後改記日本天皇年號），顯現其內心的國家認同；黃旺成、林獻堂及吳新榮則使用新曆紀年、附註舊曆的日記本，直至 1938 年之後，吳新榮才改用僅有新曆紀年者。透過他們的日記，可以實質反映臺灣人究竟如何過新年，如何接受兩個新年的過程，以及 1930 年代後期之後皇民化運動下臺人的因應之道。

總之，本文以過新年為研究對象，利用報紙和日記等一手史料，試圖重現 1890

⁸ 顏杏如，〈二つの正月：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時間の重層と交錯（1895-1930 年）〉，頁 17。

⁹ 這些日記的特色可參考許雪姬，〈張麗俊先生《水竹居主人日記》的史料價值〉，收於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中研院近史所」〕；臺中：臺中縣政府文化局，2000），頁 1-51；曾士榮，〈黃旺成日記：跨越不同政權與世代的日記〉，收於許雪姬主編，《日日是好日：臺灣日記特展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中研院臺史所」〕，2010），頁 24-25；許雪姬，〈《灌園先生日記》的史料價值〉，收於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一）》（臺北：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近史所，2000），頁(1)-(17)。

至 1940 年代臺灣人節慶生活的演變。由於清末到日治時期並沒有「春節」一詞，本文仍使用「新曆元旦」和「舊曆元旦」指稱兩種不同形式和意涵的新年。其次，為行文方便，舊曆一律以國字呈現，新曆則以阿拉伯數字表記。再者，「傳統」與「現代」的對比，僅是一相對概念，一個連續體上程度的差別而已，很難絕對的區分；¹⁰ 文化的新、舊元素更可能交錯出現在節慶生活中。以下分從 1919 年殖民政府積極推動同化政策以前，臺灣人如何從只有一個舊曆新年到部分人開始過新曆新年、兩個新年的並行、以及皇民化下舊曆新年的隱形等三大階段來論證。

二、舊曆元旦傳統的延續與變容（1890-1918）

清代漢人移民從閩、粵地區大舉移入臺灣，同時也帶來他們傳統的節慶生活；新年始終指稱農曆元旦（正月初一），禮俗眾多，直到日本統治的明治時期，僅有些微變化。

從清代至日治初期，自農曆十二月十六尾牙到十二月二十九或三十的除夕（除日），為「一年中行事結束期」；¹¹ 自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上元節（元宵節），則是一年的開始。這個月中，辭年和迎年禮俗活動甚多，如十二月二十四送神、正月初二出嫁的女兒回娘家、初四接神、初九拜天公……，因篇幅限制，無法一一贅述。本文僅概要說明過新年中最具代表性的除夕、元旦以及一些重要而延續性的活動，以略窺清末至日治初期臺灣人過新年傳統的變與不變。¹²

除夕前後數日，自清代以來臺灣人流行「送年」，或稱「餽歲」，也就是親友互相贈送年糕（糖粿）、紅柑、甜料、雞鴨等；¹³ 直到日治時期，臺人仍沿用此風俗。例如 1912 年除夕，黃旺成在公學校的學生 8 人即拿中折帽 1 頂、鞋子 1 雙、清酒白鹿 4 瓶以及凸柑 2 籠前來送年；1922 年除夕前一天，黃旺成的同事林

¹⁰ 張人傑，《臺灣社會生活史：休閒遊憩、日常生活與現代性》（臺北：稻鄉出版社，2006），頁 54。

¹¹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12），1922 年 1 月 13 日，頁 20。

¹² 本文以 1890 年代為斷限，主要是因清代史料有限，而大多引用清末的方志來討論清代臺灣人傳統過年的現象，因此以這些方志編纂的時間作為起始。

¹³ 倪贊元，《雲林縣採訪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 37 種，1959），頁 27；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安平縣雜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52 種，1959），頁 8；蔡振豐，《苑裡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48 種，1959），頁 86。

呼爐也派學生送臘腸、肉脯來。正因送年之風尚存，張麗俊也會在除夕前，到街上「備辦親朋相贈禮物」。¹⁴

除夕當天的禮俗，清代臺灣各種方志或文集記載大同小異，僅有些微的地域差異。例如清末日治初期的《安平縣雜記》詳盡記載如下：

除夕之日，各家均備饌盒、牲醴、葷素、菜品、年糕等物以祀神、祭祖。先焚香點燈燒紙，燃爆竹隆隆不絕，神前及祖宗位前均供甜料一小碟、隔年飯隔年菜各一小鍾(……)、發粿一小塊，上插通草製麗春花，……；紅柑兩碟，有用一碟者。至新年初五後撤去。是晚，一家大小團圓聚飲，棹下安放小火爐，……，名曰「圍爐」。圍爐已畢，長輩將銀錢分與下輩及婢僕等，名曰「過年錢」。亥刻，祀竈，供甜料，點燭，焚香，燒紙，亦有用牲醴、年糕、發粿者。是夜，內外上下之地，須掃潔淨。有不睡者，名曰「守歲」。家家燈燭輝煌，香煙不絕。街上行人，燈光照耀，有買物者、有收賬項者，至天亮方息。¹⁵

由上可見，除夕當日至少有祀神、祭祖、吃隔年飯和隔年菜、圍爐、發過年錢以及守歲等活動；這天，更是年底收帳的最後一日。此外，燃放爆竹，「張燈記事飲酒」，稱辭年或辭歲；¹⁶ 分賜子孫金錢，為「壓年」；¹⁷ 又張貼春聯，進行大掃除。祭祀和各項活動均有其特殊涵意，展現臺灣人慎終追遠、討吉祥及一年順遂的文化價值觀。直至大正年間(1912-1926)初期，除夕風俗大抵如此。例如1909年，張麗俊的除夕生活如下：

晴天，往墩買什物備時。……。午后，貼門聯、拜神敬祖慶祝完年。……。
晚飯畢，諸兒女俱請分壓歲錢焉……。¹⁸

¹⁴ 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一)》(臺北：中研院臺史所；嘉義：國立中正大學，2008)，1912年1月27日，頁47-48；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1922年1月26日，頁36；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一)》，1908年1月27日，頁314。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安平縣雜記》，頁8-9。

¹⁵ 林百川、林學源，《樹杞林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63種，1960)，頁101。

¹⁶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嘉義管內採訪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58種，1959)，頁40-41。

¹⁷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二)》(臺北：中研院近史所；臺中：臺中縣政府文化局，2000)，1908年1月21日，頁138-139。

1915年除夕，黃旺成一家晚上拜祖先、地基主及床母，且「家人和男雇員十幾人在二樓圍爐」，店裡人員甚至待到凌晨2點左右，直至開正才就寢。¹⁹除夕當天，市場也特別熱鬧，人山人海，「陳列物品，比往時加多」。²⁰

元旦，從清晨開始，家家戶戶於吉時起床祭拜神明，燃放爆竹，稱「開正」（或稱開春）。祭拜的供品特別使用金棗、花生、紅糕等糖料；之後，以牲禮、菜碗祭祀祖先。吃過早餐後，則穿新衣到親友家拜賀，或投名片相賀，稱「賀正」或「拜正」，或到廟裡燒香，「初二、初三亦然」。²¹見面時，則需講吉祥話；有客人到時，招待甜料，稱「請乾茶」。²²直至1911年，張麗俊的日記仍鮮活地描述舊曆元旦的作息：

晴天，午前三時早起點燭焚香，……。恭神敬祖，所謂「爆竹一聲除舊歲，桃符萬戶更新年」。四時餘祭罷，仍再就寢。黎明又起早齋，九時率諸兒燒金。午后往慈濟宮、廣和宮進香，並玩梨園。傍晚雨下數巡，振通邀住晚宴……。²³

顯然，張麗俊仍過著與清末臺灣人大致相似的元旦生活。新年期間，也有一些延續性的活動。如從正月初一到初三，一般商店均歇業，初四或初五才選擇吉辰開張；從元旦到初五，除了上述拜甜粿之外，²⁴「舉家燈火常明，謂之擎燈」，並天天燃放爆竹，²⁵又到親友家賀正，直至正月初五日，稱「假開」。²⁶

¹⁹ 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四）》（臺北：中研院臺史所；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9），1915年2月13日，頁61-62。

²⁰ 〈新竹歲市雜觀〉，《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1月17日，第3版。又如1898年，從舊曆12月28日到29日的除夕，大稻埕和艋舺兩地市場，「人眾往來雜沓，幾於擁擠不開，凡蔬果鳥獸魚肉既漲價非常。」參見〈臺俗除歲〉，《臺灣新報》，1898年1月22日，第1版。

²¹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安平縣雜記》，頁1-2；連橫，《臺灣通史》（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128種，1962；1920年原刊），頁598。

²² 倪贊元，《雲林縣採訪冊》，頁25。

²³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三）》（臺北：中研院近史所；臺中：臺中縣政府文化局，2001），1911年1月30日，頁3。

²⁴ 一般記述臺灣過年時吃的粿，有甜粿、發粿、菜頭粿、鹹粿，但仍有地域差別。例如，臺南地區沒有菜頭粿，而有紅龜。林玉茹訪問、記錄，〈林添旺先生、林王金桂女士訪問紀錄〉（未刊稿），2012年11月4日，於臺南。

²⁵ 倪贊元，《雲林縣採訪冊》，頁25；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嘉義管內採訪冊》，頁36；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安平縣雜記》，頁1。

²⁶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65種，1960；1696年原刊），頁190。

吹春、行春、春酒、春宴、休工及賭博等活動，則從元旦持續進行到元宵。吹春，又稱「噴春」，康熙年間高拱乾《臺灣府志》稱「鬧廳」：

元旦起至元宵止，好事少年裝束仙鶴、獅馬之類，踵門呼舞，以博賞賚，金鼓喧天；謂之「鬧廳」。²⁷

1898年農曆元旦，《臺灣新報》對於臺北的新年風俗也有類似記載：

臺北風俗舊曆新年，家家戶戶彩換桃符，聲傳竹爆，……，自元旦之日起，不時都有無數樂人携持鐘鼓管絃在艋舺、大稻埕向沿街紳商家中鼓吹休明，或賞兩三百文，或賞一二百文，……，此回開正即有一、二陣八音洋洋盈耳。²⁸

1906年，《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則稱「樂人自帶樂具，向人家彈奏，謂之鬧正」。²⁹「備酒席相款」則稱「請春酒」，從元旦到上元節，「搢紳之家，多設筵宴客，互相酬酢，蓋取春酒介壽之意。」³⁰在張麗俊和黃旺成的日記中，有相當多春酒、春宴或到他人家裡「行春」、「遊春」的紀錄，且經常持續至正月初五之後。例如1914年，及至正月初八，張麗俊家裡仍有親友來遊春。³¹

除了上述從清代延續而來的新年傳統之外，有些風俗到日治初期已不復存。如清初方志記載，除夕夜殺黑鴨祭神以「壓一歲凶事」；製造紙虎，塗上鴨血、豬血或生肉在門上燒掉，以禳除不祥。³²隔年菜更是從清初至清末，做法已有改

²⁷ 高拱乾，《臺灣府志》，頁190。

²⁸ 〈新年紀俗〉，《臺灣新報》，1898年1月26日，第1版。

²⁹ 〈陰曆元旦〉，《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1月30日，第4版。

³⁰ 周璽，《彰化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156種，1962；1836年原刊），頁286；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嘉義管內採訪冊》，頁36。豪富人家的年菜、春宴的景象，可參見辛永清著、劉姿君譯，《府城的美味時光：臺南安閑園的飯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179-195。

³¹ 例如，1915年2月21日，元月初八，張麗俊的妹妹、大嫂、女兒等親友到他家「遊春」；元月初九，區長舉辦春宴，日籍支廳長、警部補、校長、公醫、巡查及保正等30餘人均參加。參見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四）》（臺北：中研院近史所；臺中：臺中縣政府文化局，2001），1915年2月21-22日，頁155-156。

³²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4種，1957；1736年原刊），頁42；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121種，1962；1774年原刊），頁985；董天工，《臺海見聞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129種，1961；1753年原刊），頁32。

變。根據清初黃叔瓚《臺海使槎錄》記載，「除夕前數日，以各種生菜沸水泡甕中，以供新歲祭祀之用；餘則待發變後食之」，清末《安平縣雜記》卻已稱「隔年菜以波稜菜為之，一根而已，不折斷，名曰長年菜，過年每人須食一根」；雲林地區則「煮芥菜，待酸食之，曰長年菜」；苑裡和苗栗地區僅煮芥菜作為隔年菜。³³ 很明顯地，節慶生活除了展現地域差異之外，也會隨時間演變，產生自然而非強制性的變異，以致於日治時期一些原有的風俗習慣已自然而然地消失。

然而，殖民地時代的臺灣，面臨強調「文明開化」的日本殖民政府統治，一些固有節慶仍難免產生微變，甚至被迫調整或廢棄；舊曆新年更是在勵行西化、採用新曆新年的殖民政府漸進式的規訓下，逐漸變容。1908年以前，臺灣人大抵一如往常過舊曆新年，但1908年之後，作為官方喉舌的《臺灣日日新報》首度長篇介紹日本新曆新年的各項活動，並審視臺人在接受日本統治13年之後，仍持續過舊曆新年，「其視新曆之正月，終不如舊曆正月之親切也」，且認為「維新者則從新歲月，守舊者則仍從舊歲月也」，新、舊之間「既無害義，則從俗可也」。³⁴ 雖然沒有強烈批判臺灣人固守舊慣之不當，但遵行新曆意味著奉行日本正朔的國家認同，殖民政府除了鼓吹臺人過新曆元旦之外，最終勢必推行新曆而廢舊曆。此則報導事實上即隔年正式廢止太陰曆之先兆。

1909年11月1日，日本政府公布廢除太陰曆，並於11月7日向殖民地頒布新曆的體裁；1910年，開始禁止販賣清朝曆書，但在「舊慣溫存」的政策之下，為了讓殖民地人民感受「天家寬大之恩」，尚聽其依往例過舊曆元旦。³⁵ 不過，殖民政府仍利用各種手段漸進地示意臺灣人不過舊曆年，最先從學校教育著手。由《黃旺成先生日記》可見，大正初年學校教育對廢止舊曆新年的教化及臺人學生、老師的反應。

1912年舊曆除夕，作為公學校老師的黃旺成，仍必須到校授課，但第一節因學生太少而停課；隔天舊曆元旦，雖要求學生到校，但並不上課，點完名後即讓他

³³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頁42；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安平縣雜記》，頁8；倪贊元，《雲林縣採訪冊》，頁27；蔡振豐，《苑裡志》，頁86；沈茂蔭，《苗栗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159種，1962），頁117。

³⁴ 〈暮年景象〉，《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1月25日，第3版；〈本島人之正月〉，2月5日，第5版。

³⁵ 〈四十三年の新曆 愈舊曆は廢止〉，《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11月10日，第5版；〈鶯啼燕語〉，《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2月10日，第13版。

們回家。1913年，新竹公學校進一步打破往年慣例，舊曆新年不再放假，³⁶ 但因才剛開始實施，因此正月初一到初三早上要上課，下午則停課。儘管學校規定要上課，從元旦到初三，來上學的學生卻很少，所以黃旺成不是「不怎麼認真上課」，就是不上課，或上了1小時後，就讓學生回去。1914年舊曆元旦，學生只來了一半左右，黃旺成也只想教1小時的課，校長阿部光平卻講話達30分鐘；正月初三起，不再上半天課，而是和平常一樣，卻因下午非常多學生缺席，「第一節課就變成在消磨時間」；1月29日正月初四，校長阿部光平將正月初一到初三3天當中，缺課一天以上的學生全部集合到講堂訓話。1915年正月初二，因校長阿部光平不在，沒什麼公告，「大家隨便講，打發一小時，就讓學生回家」。1916年舊曆元旦，僅上課3小時，第一個小時將全部學生集合在講堂，校長發表關於舊曆的一場訓話，之後學生演講國語，第二個小時因有學生賭博而遭訓誡。³⁷

由上可見，1913-1916年，學校如何循序漸進地規訓臺灣人不再過舊曆新年，最初成效顯然有限，也呈現殖民地傳統文化的固著和抵抗性。不過，部分臺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在期待「近代文明」的心情下，³⁸ 舊曆過年的內容也產生些許變化。例如，1913年，黃旺成因私塾先生（老師）張麟書不喜沿用送年舊慣，而在他的發起下，與其他朋友「響應模仿新習慣，辦慶祝聚餐」。³⁹ 一般商店在新年期間原有「歇業十數天或數天不等」，今則「大抵只數日間耳」，是為「商家之進步」。⁴⁰ 更有趣的是，直接將日式的新曆新年習慣嫁接到舊曆新年。「名片交換會」是日本人新年的習俗之一，1906年1月30日的舊曆元旦正午，臺南150餘名臺灣人，即在臺南俱樂部舉行「名片交換會」，廳參事、街庄長、保正以及

³⁶ 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一）》（臺北：中研院臺史所；嘉義：國立中正大學，2008），1912年2月16-17日，頁88-89。〔按：自1898年起，後藤新平實施「無方針主義」的教育政策，亦即因地制宜，以吸引更多臺灣人入學，因此直至1912年，授權各學校可依當地實際狀況實施「臨時休業」。參見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67-69〕。

³⁷ 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二）》，1913年2月5-8日，頁54-58；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三）》（臺北：中研院臺史所；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9），1914年1月26-29日，頁25-28；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四）》，1915年2月15日，頁64-65；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五）》（臺北：中研院臺史所；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9），1916年2月4日，頁23。

³⁸ 有關臺灣人對於近代文明之渴望，參見陳培豐著，王興安、鳳氣至純平編譯，《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³⁹ 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二）》，1913年2月5日，頁54-55。

⁴⁰ 〈本島人之正月〉，《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2月5日，第5版。

臺南安平重要紳商、日本人均參加，會後並在兩廣會館舉行新年宴會，享用「本島料理」（臺菜），席間有臺人藝妓 30 餘人。「本島人于新年為名刺交換會，此實其嚆矢焉」。⁴¹ 臺、日節慶文化元素的相互嫁接，呈現殖民地過年的特色。

不過，臺人過年習俗中，唯有賭博一項卻是殖民地政府無法容忍的。從舊曆除夕到上元節，或至少元月初一到初五之間，臺人不論男女老幼，皆以賭博為樂，並有所謂「新正五日內，雖賭不禁」的說法；前述黃旺成的日記中，也可看到學生在校賭博的現象。對殖民政府而言，賭博卻是惡習，不能不禁。⁴² 因此，儘管可以容許臺人繼續過舊曆元旦，殖民政府卻自領臺以來即在新年期間強力巡緝賭博，⁴³ 相關報導非常多，賭博遂成為殖民者對被殖民者文明化規訓的象徵之一，⁴⁴ 查獲賭博的報導也屢見不鮮。過去清代過年期間可公然賭博的風俗，在日本殖民政府嚴密的警察系統規訓下，狀似逐漸消頹。

三、新曆元旦的引入與新、舊年節的競爭（1896-1918）

日本自1872年改用西曆，領有臺灣之後隨之引入殖民地。⁴⁵ 然而，1895-1915年，臺灣總督府因忙於鎮壓武裝抗日運動，開發臺灣產業，推行各項基礎建設，撲滅鼠疫、霍亂、瘧疾等傳染病或風土病，無暇顧及殖民地人民社會生活之改善。⁴⁶ 加以1898年，兒玉—後藤體制確立舊慣溫存的統治方針；直至1909年，日本帝國政府方才正式廢除太陰曆，且仍有不少本土和在臺日人使用舊曆，⁴⁷ 因此明治末

⁴¹ 〈臺南名刺交換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1月30日，第6版。

⁴² 〈本島人之正月〉，《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2月5日，第5版。

⁴³ 東仙，〈台灣の正月〉，《臺灣新報》，1898年1月16日，第3版。

⁴⁴ 〈本島人之正月〉，《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2月5日，第5版；〈本島人の新年〉，《臺灣日日新報》，1913年1月3日，第2版；〈舊曆元旦〉，1915年2月15日，第4版；〈臺北通信：舊正狀況〉，《臺南新報》，1923年2月18日，第5版。

⁴⁵ 有關日本改西曆及時間制度的引入，可參見成田龍一，〈近代日本的「とき」意識〉，收於佐藤次高、福井憲彦編，《ときの地域史》（東京：山川出版社，1999），頁352-385。

⁴⁶ 王世慶，〈皇民化運動前的臺灣社會生活改善運動：以海山地區為例（1914-1937）〉，《思與言》29:4（1991年12月），頁5。

⁴⁷ 即使日本政府公布廢除太陰曆後，日本本土的農人因農事關係，仍未用太陽曆；直至1905年日俄戰爭之後，才在地方改良運動下逐漸接受太陽曆。參見成田龍一，〈近代日本的「とき」意識〉，頁359-360。領臺初期，在臺日人仍過陰曆新年，參見顏杳如，〈二つの正月：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時間の重層と交錯（1895-1930年）〉，頁4-5。

年以前始終未積極要求臺灣人過新曆新年。

從 1897 年臺灣本地發行的報紙來看，臺灣人僅過舊曆新年，新曆新年的各項活動其實是逐漸引入，先由在臺日人發動，再漸進式地影響臺人。1897 年，首度看到臺灣人仕紳 3 人參加「官民協同的新年宴會」。⁴⁸ 1898 年元旦，因國喪，官廳沒有舉辦大規模的新年慶祝活動；《臺灣日日新報》即指出，此時 3 百餘萬臺灣人，雖成為「我皇臣民」，但多遵行中國舊慣過舊曆新年，新曆元旦插門松、掛稻草繩（注連繩）者僅參事或街庄長。臺南地區，僅「內地人」（日本人）掛國旗，臺人則「回禮」（拜年交換名片）頗多；彰化地區也大多是日人掛門松、稻草繩。⁴⁹ 掛國旗、在門前掛上門松和稻草繩，成為接受新曆新年的象徵。

學校是規訓臺灣人過新曆新年的主要場域。1900 年新曆元旦，國語學校及附屬小學師生唱國歌「君之代」，共同祝賀新年，隔日職員和師生 250 餘人在校內舉行新年宴會；⁵⁰ 同年，也在淡水館首度舉辦日本人新年的重要活動：「名片交換會」或「名片交禮會」，⁵¹ 此後臺北每年都固定舉行官民共同參加的名片交換會，又因人數越來越多，而不斷變更地點。⁵² 1905 年元旦，新竹廳已有元旦祝賀會，新竹公學校等各校聚集學生行祝賀典禮和名片交換會，各市街門懸國旗，掛稻草繩；1906 年，文武官僚、各區街庄長以及「保正紳商士庶人等」，共 390 餘人參加；⁵³ 同年，臺南地區官民也在臺南俱樂部舉辦 2 百多人的名片交換會。⁵⁴

此時期的名片交換會，是由臺灣人學校師生、地方保正、街庄長以及紳士參加。人數最多幾百人，且逐漸定型化，大致由廳長先致詞，三唱天皇陛下萬歲之後散會，少數會舉辦酒宴，之後儀式漸形繁複。1907 年，時任保正的張麗俊也參

⁴⁸ 〈官民協同的新年宴會〉，《臺灣新報》，1897 年 1 月 7 日，第 2 版。

⁴⁹ 〈臺南通信：新年的景況〉，《臺灣新報》，1898 年 1 月 16 日，第 3 版；〈彰化通信：彰化的新年〉，1 月 18 日，第 3 版。

⁵⁰ 〈本日の新年祝賀式：國語學校及附屬學校〉，《臺灣日日新報》，1900 年 1 月 1 日，第 2 版；〈臺北的新年雜俎：國語學校の歲旦〉，1 月 5 日，第 2 版。

⁵¹ 1897 年元旦，基隆首見由日本人發起的名片交換會，但不確定有無臺灣人出席。〈官民協同的新年宴會〉，《臺灣新報》，1897 年 1 月 7 日，第 2 版。

⁵² 1907 年臺北地區的名片交換會改到臺北俱樂部舉行，之後又換到鐵道旅館。〈名刺交換〉，《臺灣日日新報》，1900 年 1 月 5 日，第 2 版；〈臺北新年名刺交換會〉，1905 年 1 月 8 日，第 6 版。

⁵³ 〈新竹新年〉，《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1 月 8 日，第 6 版；〈名刺交換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1 月 9 日，第 4 版。

⁵⁴ 〈臺南元旦：名刺交換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1 月 9 日，第 6 版。

加葫蘆墩支廳的新年祝賀活動：

往墩，仝春池先入公學校，與校長三田愛藏君賀新禧。九時餘諸保正在役場候齊，入支廳恭賀新年，並行四方拜之禮焉。十時餘出廳，仍在役場坐談，及鐘鳴十二，俱再入支廳饗午，獻酬交錯，杯盤狼藉，方各散出，而巡查等尚在酣戰中。⁵⁵

由上可見葫蘆墩支廳新年慶祝典禮的儀式和宴後飲酒的習慣。⁵⁶ 不過，此時僅有少數與日本官方相關的臺灣人會參加其舉辦的新年活動，且主要是配合日本人的邀約而應酬，但回到家裡，卻沒有任何的過節活動。張麗俊甚至不一定出席新年典禮，有時僅派家人代表參加。⁵⁷ 由 1907 年報紙的報導可證實，此時僅學校和奉職於官廳的臺人過新曆新年：

依然固守陰曆之本島人。于陽曆之歲暮。似無甚關係者。然與官衙關係之街庄長役場。……他如奉職于官衙之本島人。皆以新年應為祝賀。甚覺留意。而與內地人有交際之事者。于歲暮亦各紛々遺贈其禮物。⁵⁸

1909 年日本政府廢太陰曆之後，臺灣各地官廳更加重視推行新曆元旦。1910 年，新庄支廳更寮、新塹二庄，實行「舊曆廢止」，舉庄均掛國旗，更在街庄長、區長以及保正的企畫下，舉辦新年宴會。⁵⁹ 1910-1911 年，名片交換會逐漸在全臺各廳流行，包括宜蘭、桃園、新竹、臺中、嘉義、打狗、鳳山、阿猴等，開始出現由廳召開集體名片交換會或新年宴會的報導。宜蘭地區有「沿家逐戶，遍插國旗」的新年新意象；嘉義地區則有本島人商店「休業以表祝賀者」。⁶⁰ 觀諸張

⁵⁵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一）》，1906 年 1 月 1 日，頁 156。

⁵⁶ 新年儀式中有「御真影奉拜式（或稱「戴拜式」）」，最早見於 1899 年由臺灣總督府舉行的新年祝賀活動。參見〈總督府に於ける新年式の次第〉，《臺灣日日新報》，1899 年 12 月 29 日，第 2 版。

⁵⁷ 1909 年和 1911 年，新曆元旦，張麗俊均請清漣代為出席新年活動。參見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二）》，1909 年 1 月 1 日，頁 134；1911 年 1 月 1 日，頁 441。

⁵⁸ 〈本島人之于歲暮〉，《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12 月 26 日，第 5 版。

⁵⁹ 〈舊曆廢止萬行の庄民〉，《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1 月 19 日，第 5 版。

⁶⁰ 〈消防初出〉、〈廳長視學〉、〈賭徒入網〉，《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1 月 5 日，第 5 版；〈紀名刺交換會〉、〈臺中賀年〉、〈鳳山之元旦〉、〈嘉義之元旦〉、〈打狗之元旦〉、〈宜蘭之元旦〉，1911 年 1 月 3 日，第 2 版；〈彰化之元旦〉、〈臺南元旦景象〉、〈阿緞之元旦〉，1 月 5 日，第 3 版；〈宜蘭の新年〉，《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1 月 18 日，第 2 版。

麗俊和黃旺成的新年活動，1912年張麗俊一如往常，進入葫蘆墩支廳恭賀元旦，「行遙拜式」，中午到聖母廟參加支廳長慰勞保正的酒宴，保正全員出錢「演戲祝賀元旦」；黃旺成則到學校參加新年典禮。新竹公學校因被指定為名片交換會的會場，相當熱鬧。會後，他也與其他同事一起寫賀年卡（年賀狀）給在臺北國語學校的老師，晚上參加新年宴會。⁶¹

臺灣人本來就有在新年時寫賀年信的習慣，⁶² 然而開始在新曆元旦寫賀年卡，大多是給互相交際的日本人。例如，1906年12月29日，張麗俊即在永昌商行代朋友寫「賀日本春禧郵稟」。⁶³ 不過，賀年卡數量的增加，象徵臺灣人逐漸接受新曆新年的程度。1917年，臺北郵局統計當年寄送的賀年卡，將近88萬件，比1916年增加28萬餘件；南部的打狗則是近20餘萬件，增加速度沒有臺北快。⁶⁴ 顯示臺灣南、北地區對新曆新年接受程度大有差別，北部認同度顯然遠比南部高。

臺灣神社於1901年建成，被視為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象徵之一，即所謂「臺灣總鎮守」，也是國家祭祀的場所。⁶⁵ 神社的歲始祭於1905年新曆元旦首度舉行，但除了臺北廳長之外，主要是各級軍官參加。⁶⁶ 此後，臺灣神社每年都舉行歲始祭，直至1910年才明顯看到臺灣紳士「往者亦有之」；1915年，中學生開始到臺灣神社參拜。1917年改曆會盛行之後，基隆神社也舉辦「歲旦祭」。⁶⁷ 之後，元旦參拜神社逐漸擴及至臺灣各地陸續建成的神社。⁶⁸

隨著引入新曆元旦，日本人原有的「歲末大拍賣」和摸彩（抽福引）送獎品（景品）的習慣，也移植臺灣。1907年元月，臺中市各商店即進行聯合商品拍賣的活動；1913年12月，家裡經營陵豐雜貨店的黃旺成，也請同事張澤寫3張「附

⁶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三）》，1912年1月1日，頁151；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一）》，1912年1月1日，頁1-3。

⁶² 例如1897年，泉州的謙順號寫賀年信給鹿港謙和號的許志湖，並送魚子和極柑。參見林玉茹、劉序楓編，《鹿港郊商許志湖家與大陸的貿易文書（一八九五～一八九七）》（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06），頁198-199。

⁶³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一）》，1906年12月29日，頁154。

⁶⁴ 〈臺北年賀便：大約一百萬通〉、〈打狗賀信增加〉，《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1月8日，第3版。

⁶⁵ 蔡錦堂，〈日本治臺時期的神道教與神社建造〉，《宜蘭文獻雜誌》50（2001年3月），頁23-24。

⁶⁶ 〈新年之臺灣神社〉，《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1月8日，第6版。

⁶⁷ 〈新年之臺灣神社〉，《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1月8日，第6版；〈臺北新年光景〉，1910年1月5日，第2版；〈年始神社〉，1915年1月5日，第4版；〈基隆の三箇日〉，1917年1月4日，第2版。

⁶⁸ 臺中神社1912年、臺東神社1911年、花蓮港神社1916年、基隆神社1915年、新竹神社1918年建成。參見蔡錦堂，〈日本治臺時期的神道教與神社建造〉，頁18。

贈品的歲暮聯合大拍賣」廣告。⁶⁹

1910 年之後，輿論更經常抨擊臺灣人仍「固守」舊曆新年，同時評估新曆新年被接受的程度。例如 1911 年有報導如下：

……是雖為陽曆之迎年。舉祝者但為內地人。本島人墨守陰曆。多不與於此。然官衙學校其他會社商店。本島人多羅身其列。與有密接關係。故彼華服往來者。亦不一其儔。特如公學校生徒尤爾也。⁷⁰（底線為筆者所加，後續引文亦同）

從上可見，由於臺灣人仍持續過舊曆新年，因此由明治年間官、學兩界的帶頭示範和實踐，到工商業界及庶民開始過新曆新年，為大正年間推廣新曆元旦的主要趨勢。對殖民者而言，除了形式上掛國旗、門松、稻草繩，參加新年的各種祝賀典禮之外，1 月 1 日到 3 日為日本正月，⁷¹ 臺人商店是否從俗歇業係另一指標。

明治年間到大正初期，臺灣人商店在新曆新年往往照常營業，且各地狀況不一。1912 年元旦，報載艋舺和大稻埕「本島人部落」一年比一年重視新曆新年，門懸國旗，賀客相當多，臺人商店大多「閉門休業」，拿紅色名片「迴禮者多」，且「爆竹之聲，轟轟不絕」；連臺南地區臺人亦「迴禮顯著增加，閉店也處處可見」。但是，1913 年元旦，卻連「大稻埕及艋舺之本島人則如舊開張營業矣」。⁷² 很明顯地，臺人商業界於新曆新年全面歇業甚遲，直至 1910 年代後期，經由同風會、改曆會以及地方街庄長的提倡，才漸有成效。

1914 年，板垣退助⁷³ 伯爵來臺，並集結日本人、臺灣人組成臺灣同化會；11 月，樹林區長黃純青，為革新社會風俗、矯正陋習，推行日語，創設教化大眾

⁶⁹ 〈中部的新年景況〉，《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1 月 8 日，第 5 版；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二）》，1913 年 12 月 26 日，頁 441-442。1913 年 11 月，謝雪紅到臺中時，也看到市面上正在舉行「抽景品」活動，而詳細描述當時如何抽獎及獎品分等狀況。參見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我的半生記：臺魂淚（一）》（臺北：楊翠華，2004 年再版），頁 74。

⁷⁰ 〈元旦景象〉，《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1 月 3 日，第 2 版。

⁷¹ 正月時間，國民家家樹門松、掛稻草繩，元旦早起汲水祀神，供奉鏡餅，或出門拜年。參見皇民文庫刊行會編纂，《徵兵制に備へる：臺灣皇民讀本》（臺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1943），頁 120。

⁷² 〈臺北的新年：艋舺与大稻埕〉，《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1 月 3 日，第 5 版；〈臺北新年：稻舡街面〉，1 月 5 日，第 4 版；〈臺南的新年〉，1 月 7 日，第 1 版；〈市上二日〉，1913 年 1 月 3 日，第 4 版。

⁷³ 板垣退助為日本明治維新功臣，也是自由民權運動的指導者。參見黃昭堂著、黃英哲譯，《臺灣總督府》（臺北：前衛出版社，2002），頁 135-136。

的組織樹林同風會，為臺灣同風會之濫觴，後漸擴及三角湧（三峽）支廳管內。⁷⁴ 1917年，嘉義廳和桃園廳已設立同風會，基隆另有敦俗會，宜蘭則有敦風會。⁷⁵ 這些組織以改良臺人社會生活為主，改曆更是其重點。1916年元旦，最先創設同風會的樹林區，庄民即立門松、掛國旗，開名片交換會，又飲春酒，⁷⁶ 學習過日式新年；彰化地區臺灣人也大多停止業務，立門松。⁷⁷

另一方面，1916年11月，由《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發起，12位臺灣紳士表態支持，成立改用新曆的「改曆會」，⁷⁸ 預定自1917年1月1日實行改曆，具體做法為「從新則揭國旗，掛七五三繩，設門松；從舊則換桃符，爆竹，懸燈掛彩，均從其便。賀年名刺紅白不拘，各休業三日，共伸賀意」；原舊曆元旦則行「紀念祭」。⁷⁹ 換言之，有別於樹林區全面改行日式，改曆會認可舊曆新年的風俗，將其直接嫁接至新曆新年。改曆會的宣言，加上同風會的推波助瀾，1917-1918年全臺各地掀起一波新、舊元素交融的過新曆元旦熱潮；三角湧每年舊曆正月初六的祖師廟例祭即決定移至新曆1月6日舉行。基隆敦俗會則由支持改曆會的顏雲年和許梓桑召集區長，決定10項夾雜新、舊元素的新年儀式或活動，包括：各戶休業三日，隨意裝飾門聯和門松、掛國旗、發賀年卡並吹春，各寺廟舉行新年式，歲暮贈禮，元旦參拜臺灣神社或各寺廟，舊曆正月初一為紀念祭日且休業一日，新曆1月1日為名片交換會，1月6日為新年宴會。宜蘭敦風會也揭槩16項準則，大抵雷同，又新增12月24日送神、年末圍爐，各戶炊甜粿、菜頭粿及發粿，年末清算帳項，1月15日為上元，慶演龍燈。⁸⁰

很明顯地，同風會和改曆會不僅鼓勵臺灣人過新曆元旦，有些地區甚至企圖讓新曆年完全取代舊曆，而將原舊曆新年的各項活動直接嫁接至新曆。其確實某種程度地讓不少地區，特別是地方紳士或區長較為積極改曆的街庄，開始嘗試接

⁷⁴ 王世慶，〈皇民化運動前的臺灣社會改善運動：以海山地區為例（1914-1937）〉，頁5-7。

⁷⁵ 〈基隆敦俗會決議〉、〈宜蘭敦風會決議〉，《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12月15日，第6版。

⁷⁶ 〈實行陽曆〉，《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1月12日，第6版。

⁷⁷ 〈彰化之元旦〉，《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1月3日，第5版。

⁷⁸ 〈改曆會序〉，《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11月26日，第6版。〔按：《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主筆，1901-1922年由尾崎秀真擔任〕。

⁷⁹ 〈改曆會序〉，《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11月29日，第5版。

⁸⁰ 〈三角湧改曆特色〉，《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12月25日，第4版；〈基隆敦俗會決議〉、〈宜蘭敦風會決議〉，1917年12月15日，第6版。

納新曆新年。舉例而言，1917年，大稻埕一部分、艋舺則有八、九成的臺人掛日式稻草繩，改曆實踐者1月5日於春風得意樓舉辦新年祝賀會；新店支廳管內則「全部以內地式迎接新年」，又於集應廟召開祝賀會。⁸¹ 臺南地區，大部分的臺灣人從該年起準備迎新曆元旦，立門松；基隆地區臺人實行改曆，樹門松；桃園、臺中兩廳甚至被稱改曆「頗見成績」；⁸² 連始終未改曆的張麗俊，也於本年第一次邀集11位臺人在家舉辦新曆元旦春宴。⁸³ 1918年，大稻埕和艋舺地區的新曆新年，更有如下之報導：

本年新正。因稻艋及市外各本島人。皆以自發心贊成新曆。故其氣象煥然一新。與過舊曆新正殆無以異。……稻江經區長等出為提倡。保甲又開會議。各戶軒前皆插竹松。其事由壯丁團辦理之。至炊年糕。禮神明。商店各休業一天。亦無不一律實行。尤可喜者則恭詣臺灣神社參拜者。亦與內地人相前後。……又各商店新年宴會。亦多擬就近日行之焉。⁸⁴

由上可見，由於改曆被認為是「同化的第一步」，⁸⁵ 透過同風會和改曆會的提倡，部分臺灣人開始接受新曆新年。然而，如同顏杏如已經指出，參加改曆會者大半為區長、甲長及保正，並透過保甲壯丁團執行，⁸⁶ 因此成效有限，僅讓部分臺灣人逐漸習慣在新曆新年擺上門松、國旗以及稻草繩，形式上宣稱改曆，但仍舊持續過舊曆新年。例如，1916年年底，在同風會和改曆會積極鼓吹改曆的時代氛圍下，張麗俊首度過新曆除夕和新年，甚至張貼春聯，但日記即明白點出：

到保甲聯合所交深喜開賀支廳新禧買物金壹円式拾錢，近午歸。午后在家拜神祭祖，祝告完年，因地方官會議迫全新曆過年，不許照舊曆過年故也，但民情尚未革故鼎新，雖表面奉從，只是聊應故事而已。⁸⁷

⁸¹ 〈新年的第二日：改曆會と本島人〉，《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1月3日，第2版；〈同化的第一步：臺北の改曆祝賀〉，1月4日，第2版；〈臺北賀年便〉、〈打狗賀信增加〉，1月8日，第3版。

⁸² 〈各地の元旦：臺南〉，《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1月2日，第2版；〈基隆の三箇日〉，1月4日，第2版；〈舊曆の歳の市 案外景氣が好い：舊曆の正月〉，1月23日，第7版。

⁸³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四）》，1917年1月1日，頁418。

⁸⁴ 〈本島人及新年〉，《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1月2日，第4版。

⁸⁵ 〈督邸新年宴〉、〈立川廳長宴客〉，《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1月8日，第3版。

⁸⁶ 顏杏如，〈二つの正月：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時間の重層と交錯（1895-1930年）〉，頁11。

⁸⁷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四）》，1916年12月31日，頁417。

他一語道出 1910 年代後期，部分臺灣人在地方官廳的脅迫之下，不得已開始過新曆新年，但不過是表面奉從，「聊應故事而已」。也因此，南部地區，加入改曆會者寥寥；嘉義是少數較早設立同風會的地區，但「市上舖戶行商多依舊營業。若燃放爆竹，投刺賀正者，則寥如晨星」，各地依舊過舊曆新年；1917 年舊曆元旦，艋舺、大稻埕仍相當熱鬧。⁸⁸ 張麗俊和黃旺成也持續過農曆年，進行各種活動，不僅春宴邀約很多，1918 年張麗俊還特地記錄其正月初二一早，在家結算 1917 年度的收支帳項，「並應接鼓樂來恭賀新年者」，晚上還叫兒子們「邀鄰近親朋十餘人來赴新春宴」。⁸⁹ 由此可見，1910 年代過舊曆年仍是主流，且由於各地條件不一，對新曆新年的接受度也各不相同；如同此時殖民政府引進標準化時間制度有城市先鄉村後、北部先中南部後的落差，⁹⁰ 北部因臨近統治中心，盛行過新曆年大致早於南部。其次，改曆主要透過地方行政系統和學校教育來推動。然而，直至 1920 年，臺灣人公學校入學率偏低，1915 年入學人數不及總人口的 10%，才 15 萬多，且偏向社會中、上階層的子弟，⁹¹ 學校教育的影響力仍相當有限。因此，1910 年代後期，只能說是在同風會和改曆會「文明化」、「改良民俗」以及「同化」的號召下，促使部分臺人開始嘗試過新曆新年，而非全面性普及。

總之，從 1897 年有報紙紀錄開始，新曆新年的各項活動其實是逐漸引入臺灣，先由在臺日人接受，再漸進式地擴及至臺灣人，且隨著時代氛圍的變化，層累地增加。不同身分、階層、地域及性別對新曆年的接納程度也各異；基本上，1919 年臺灣總督府正式施行同化政策之前，新曆新年仍未真正普及至臺人的生活當中。其次，1916-1917 年同風會和改曆會推行改曆的過程，充分顯現了新、舊曆元旦之間新、舊及異文化元素的互相嫁接。新曆新年的普及化則要等到 1920 年代臺灣殖民統治的文官總督時代。

⁸⁸ 〈本日は舊元旦〉，《臺灣日日新報》，1917 年 1 月 23 日，第 7 版；〈嘉義舊曆元旦〉，1 月 26 日，第 6 版。

⁸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五）》（臺北：中研院近史所；臺中：臺中縣政府文化局，2002），1918 年 2 月 12 日，頁 149。

⁹⁰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頁 63。

⁹¹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92），頁 317。

四、兩度迎年：規訓與不完全同化（1919-1936）

1919年，第8任臺灣總督田健治郎上任。作為第一位文官總督，治臺方針改採內地延長主義、實行同化政策為重心，⁹² 倡導同化的同風會遂大為普及，⁹³ 艋舺、大稻埕均隨之創設。1920年，殖民政府進一步廢除延襲自清代的堡區街庄，改行市街庄制，設置市役所、街庄役場，確立市街庄為基層行政組織。街庄也成立各種教化團體，與警察系統、學校成為社會教化革新的基層結構。⁹⁴

改曆和推行新曆新年成為同化政策的重點之一。1920年代以後《臺灣日日新報》當中有關舊曆新年的報導也越來越少，城市和中、上階層的臺灣人逐漸普遍過新曆元旦，且進一步發展出各種新儀式或活動，並非如前僅是虛應故事地擺門松、掛稻草繩和國旗而已。首先，夾雜新、舊元素的新曆年活動盛行於城市。1920年，大稻埕臺人的新曆新年情況如下：

因同風會提倡，實行改曆，恭奉正朔。各街各戶，多半依內地人迎年體制。樹門松，為注連飾，歇業嬉春。餘亦換新桃符，照本島慣例裝飾，洵為快事。⁹⁵

連報導的記者，都指出「商業舊慣也逐漸改變，改曆並非僅是徒具形式」。⁹⁶ 臺南地區則是：

本年（1920）鑑於各地實行改曆，臺南素為首善之區，恐落人後，尤為踴躍準備。紳士家、實業家，打掃廳堂、結綵掛聯。各市街商舖，裝飾電燈等々，門前各安排賀正收納名片棹。即尋常人家亦皆桃符換新。至各寺廟，亦由風俗改良會員通知，一律照新年元旦，鳴鐘擊鼓，以便市民參拜。各街閉店，靜肅無譁。遊人如織，誠有迎春新景象云。⁹⁷

⁹² 黃昭堂著、黃英哲譯，《臺灣總督府》，頁138、151。同化主義為明石原二郎任臺灣總督（1918-1919年）時確立的治臺政策。參見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臺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1937-1945）〉，收於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35。

⁹³ 顏杳如，〈二つの正月：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時間の重層と交錯（1895-1930年）〉，頁11-12。

⁹⁴ 王世慶，〈皇民化運動前的臺灣社會生活改善運動：以海山地區為例（1914-1937）〉，頁6。

⁹⁵ 〈大稻埕新年行事 同風會提倡〉，《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1月4日，第4版。

⁹⁶ 〈大稻埕の新年 改曆は實質までも〉，《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1月3日，第2版。

⁹⁷ 〈赤坂短訊：迎春景象〉，《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1月3日，第2版。

由此可見，南、北兩大城市在同風會或風俗改良會的強力主導下，均開始盛行過新曆元旦，但北部較強調儀式的「內地化」；南部則是將舊曆新年的風俗直接嫁接至新曆，特別規定寺廟鳴鐘擊鼓，以讓市民參拜。顯然，儘管風俗「不完全同化」，卻以臺灣人正式改曆，奉日本正朔為第一目標。1921年元旦，遠在後山的臺東廳，也首見臺灣人「從本年」豎立門松，參加回禮，官民並在料亭（高級日本料理餐廳）「富の家」召開新年懇親祝賀會；⁹⁸ 就連黃旺成到彰化，也指出「出行街，頗有新年氣象」。⁹⁹

臺灣人主動參與或發起各項新曆元旦活動，也越來越普遍，甚至女性也亦然。首先，由各州廳舉行的新年祝賀典禮更加繁複而盛大，先前大多由地方首長致詞後，高唱三聲萬歲即結束，之後又加上奉拜「御真影」；到了1920年代，不但新增賜饌、唱國歌、奏樂等儀式，各機關團體也會自行舉辦祝賀典禮，參加者規模甚至千人以上，¹⁰⁰ 與先前的幾百人不可同日而語。

1月5日，按日本慣例為新年宴會日，原由官廳或學校於新年期間舉辦。¹⁰¹ 1914年，艋舺區長吳昌才發起新年宴會，會場在龍山寺後殿，有百餘人參加；1920年，大稻埕全市300餘人已在有名的酒樓東蒼芳開新年宴會。1926年，瀛社更將例會改在1月6日於龍山寺舉行新年宴會；連中壢的米穀商組合，也於同年1月4日舉辦新年宴會。1935年，基隆同風會甚至在市民的新年宴會，增加魔術、藝妓演奏和演唱等多種餘興節目。¹⁰² 除了大規模的新年宴會之外，臺灣人、特別是知識分子或地

⁹⁸ 〈臺東の新年〉，《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1月4日，第2版。

⁹⁹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12），1921年1月1日，頁2。

¹⁰⁰ 以1925年為例，臺北地區的新年祝賀典禮，從總督府、各州廳、軍司令部、法院、市役所、各警察署均舉行；基隆市在公會堂的祝賀典禮，官民共1,400餘人。1936年臺北官民共1,600餘人參加。參見〈臺北新年拜賀式〉，《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1月2日，第8版；〈初日麗かな島都 新春を壽ほく 官民千六百餘名一堂に會し 新年交禮會を開催〉，1936年1月3日，第2版。

¹⁰¹ 例如，1912年、1913年、1917年，黃旺成均參加學校舉辦的新年宴會；1916年，張麗俊也參加葫蘆墩支廳舉辦的新年宴會。參見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一）》，1912年1月5日，頁10-11；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二）》，1913年1月5日，頁8；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六）》（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10），1917年1月5日，頁4-5；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四）》，1916年1月5日，頁278。

¹⁰² 〈艋舺新年宴會〉，《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1月7日，第6版；〈大稻埕新年行事 同風會提倡：新年宴會〉，1920年1月4日，第4版；〈瀛社新年宴會 兼祝劉克明君敘勳〉，1926年1月2日，第8版；〈中壢米穀商組合 有志新年宴會〉，1月5日，第2版；〈基隆同風會 新年宴會 七日在高砂樓〉，1935年1月6日，第8版。

方望族，會在家中自行舉辦春酒或春宴等活動；1920年代新曆新年期間，張麗俊和黃旺成參加過臺人舉辦的春酒、春宴的紀錄也逐漸頻繁。¹⁰³此外，1930年代之後，12月28-30日之間，林獻堂和張麗俊也經常參加類似傳統尾牙的忘年會活動。¹⁰⁴

名片交換會的規模則不僅越來越龐大，由先前的幾百人變成千餘人，也擴及婦女和各種團體。1920年元旦，日本人和臺灣人在大稻埕女子公學校聯合舉辦新年名片交換會，會眾達千餘名，「比去年由保甲提倡者，多一倍餘」；下午則召開女子名片交換會，「雖本年濫觴伊始，會者亦有約二百名」，會眾大半為各女校畢業生。1月7日，臺北地區婦女於鐵道旅館舉辦臺北婦人名片交換會；臺中愛國婦人會員和篤志護婦人會員，則在臺中座開新年名片交換會。¹⁰⁵特別針對女性召開新年名片交換會，也象徵此時職業婦女地位和女性意識的抬頭，更意味著新曆元旦的儀式性活動已打破性別的藩籬，直接滲透至部分臺灣女性的節慶生活。

新曆元旦參拜神社也越來越流行，規模日益盛大，本島人個人和團體參拜更多，且逐漸普及至中產階級和婦女。例如，1922年元旦，臺北人士到臺灣神社參拜，「或步行、或乘車」，「就中本島人團體或個人，恭到參拜者，比年尤盛」；1923年元旦，新竹、臺中、嘉義、臺南以及高雄等各神社均先於清晨舉行歲旦祭。¹⁰⁶1925年，在總務長官後藤文夫的帶領下參拜臺灣神社，總參加人數約8,700人以上；且本島人參拜者，「除上流階級而外，中流階級並婦人之參詣者，頗不乏人」，其中「以奉職各官衙、及諸會社員為最多」。¹⁰⁷一語道破至神社參拜的臺灣人

¹⁰³ 例如，1923年1月5日，張式毅、張傑邀請黃旺成一起到新竹客雅莊「共酌春酒、戲昇官【圖】」；1924年元旦，新竹望族李陵茂家的李良璧邀請黃旺成到家裡參加新年春宴。參見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十一）》（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12-2013），1923年1月5日，頁8；1924年1月1日，頁2。

¹⁰⁴ 1933-1935、1937、1943-1944年，林獻堂均參加歲末忘年會；張麗俊則是1934、1936年有參加忘年會的紀錄。參見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六）》（臺北：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近史所，2003），頁495；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七）、（八）》（臺北：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近史所，2004），頁478、455；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九）、（十五）、（十六）》（臺北：中研院臺史所、近史所，2004-2008），頁422、412、422；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九）、（十）》（臺北：中研院近史所；臺中：臺中縣政府文化局，2003-2004），1934年12月29日，頁531；1936年12月30日，頁303-304。

¹⁰⁵ 〈大稻埕新年行事 同風會提倡：男子名刺交換會〉、〈大稻埕新年行事 同風會提倡：女子名刺交換會〉，《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1月4日，第4版；〈臺北婦人會〉、〈新年婦人會〉，1月9日，第6版。

¹⁰⁶ 臺南神社和高雄神社分別於1923、1920年建成。其餘神社則在1920年以前已建。參見蔡錦堂，〈日本治臺時期的神道教與神社建造〉，頁18。

¹⁰⁷ 〈臺灣神社參拜〉，《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1月2日，第4版；〈各地方之元旦〉，1923年1月3日，第4版；〈年々盛んに為り行く 臺灣神社の初詣り：未だ夜も明けやらぬ中 から參道は人で満つ〉，1925年1月2日，第7版；〈本島人有志參拜〉，1月2日，第8版。

仍以來自地方官衙、會社的中、上階層家庭居多。1936年，隨著時局的變化，新曆年到臺灣神社參拜者則已高達2萬人以上。¹⁰⁸

從新曆年末到過年期間，也開始出現各種新組織和團體的活動，名目眾多，隨時間推移而增加。舉例而言，1926年1月3日，臺北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舉行同窗生新年交禮會兼親睦會；1934年1月5日，花蓮港在鄉軍人分會及街役場主辦新年射擊會，婦人亦參加；1936年元旦，吳新榮也發起東京臺灣留學生的聚會「旭翠會」。¹⁰⁹ 由於新曆新年放假，因此成為不少臺灣人參與各種聚會、聯誼活動的日子，也進一步讓他們習慣過新曆年。

更值得注意的，是元旦出遊的流行。圓山動物園於1914年4月開園，早在1918年，臺北的臺灣人便會在新春期間帶兒女去遊玩。1922年1月2日，從臺灣神社到圓山動物園周邊，人潮絡繹不絕；至1936年，甚至有「圓山一帶遊人如鯽，車水馬龍」之盛況。¹¹⁰ 由黃旺成的日記也可見，1922年新曆元旦，他家已有「新正之嬉遊」計畫，1923年更打算「偕兒曹恣意一遊」。¹¹¹ 甚至在嘉義地區，1925年元旦也已有很多人到嘉義公園遊玩。¹¹² 除了去這些現代化的動物園、公園遊玩之外，臺人也開始按原舊曆新年的習慣，在新曆年到廟裡燒香拜佛。1925年，艋舺龍山寺此時非常熱鬧，更有甚者，也可看到婦女於新春期間「詣廟行香」的報導；¹¹³ 1933年1月2日，林獻堂還與家人15人先後浩浩蕩蕩地到臺中看矢野曲藝團表演。¹¹⁴

商店和一般人民是否按照殖民政府引入的時間制度，在新曆年休業3天，一直是臺灣人是否改曆的指標。以商店歇業的狀況而言，1920年代以後，於新曆元旦期間歇業逐漸成為慣例。1922年《臺灣日日新報》有一番新、舊氣象比較如下：

¹⁰⁸ 〈臺灣神社初詣で 約二萬人に上る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1月3日，第2版。

¹⁰⁹ 〈附公同窓親睦會〉，《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1月2日，第8版；〈婦人も加つて 新年射擊會 婦人の一等三十七點〉，1934年1月7日，第3版；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輯，《吳新榮日記全集（一）》（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7），頁176。

¹¹⁰ 〈動物園の假開園：愈々明後五日より開園〉，《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4月3日，第7版；〈新春三日光景〉，1918年1月5日，第6版；〈流石は新春：お正月氣分濃厚〉，1922年1月4日，第3版；〈旭旗翩翩門松聳翠 往來士女皆是嬉春：臺北新年極形熱鬧〉，1936年1月3日，第8版。

¹¹¹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1923年1月1日，頁2。

¹¹² 〈嘉義春色雜俎：公園賞花〉，《臺南新報》，1925年1月3日，第4版。

¹¹³ 〈臺北新春景象〉，《臺南新報》，1925年1月6日，第5版。

¹¹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六）》，1933年1月2日，頁3。

昨曉元日，……，市內各大小街庄，自同風會逐年鼓〔按：鼓〕吹，爾來勵行新曆祝歲，漸漸習慣。各家桃符新換，松竹映綠，大小商店一體休息。視數年前，區區內地人商店輻輳之地，休業祝歲，而本島人商店，依舊隨意開張，舖頭陳貨，恬然貿易。不知元旦為何日者。異若霄壤〔按：壤〕。故昨早巡覽各街，無論為內地商店或本地商店，皆收閉舖面，店員一切到處通刺，表祝賀新歲誠意，蓋有漸近同化之氣象，而非偶然者矣。¹¹⁵

此報導充分展現 1910-1920 年代，臺灣人商店逐漸改曆的原因和過程，同時也反映 1920 年代的積極改曆是為實行同化政策，其效果則甚彰顯，並非「偶然」而已。證諸張麗俊該年（1922）的日記，也提到新曆新年豐原街上的商舖，「俱遵新曆完年休業」；1923 年 1 月 2 日，黃旺成指出新竹「各商店除飲食店、菓子店外，尚閉門休業，以表迎正之意」。¹¹⁶

過年的意義，也表現在一年終止和年度結算時間之改變，這也是不少臺灣人始終不改曆的原因之一。誠如前述，身為保正和協議會員的張麗俊，自始至終均使用舊曆，也在舊曆年末計算一年收支帳務。中上階層、在會社上班者、學校師生以及有小孩上學的家庭，顯然最早接受新曆新年的生活作息。黃旺成從 1912 年的日記開始，即於新曆年末計算年度帳項。1919 年 12 月 31 日，他第一次稱「新曆除日，店內亦依眾作之」，換言之，陵豐商店開始從俗過新曆除夕；不過，他本人實際改曆，真正過新曆新年，仍是到 1920 年代才開始。例如，1921 年 12 月 30 日，黃旺成即帶 2 個孩子到私塾先生張麟書家送束脩，並各領椪柑 2 個回家；隔日，清水望族蔡蓮舫也從臺中寄給他年終獎金 200 圓。1922-1924 年，黃旺成任職於蔡蓮舫家，每年大約固定於 12 月 28 日回新竹過新年，1 月 6-9 日之間回臺中上班。有趣的是，雖然年度的計算已改為新曆，但直至 1921 年，蔡蓮舫和黃旺成在新曆新年卻沒有特別的慶祝活動。1922 年 12 月 31 日，黃旺成才指出：「兒童等皆休業在家，予不得不學改曆，使兒童滿足」，當晚全家圍爐，還幫泉興商號的林鵠書寫春聯。¹¹⁷ 自該年起，他才真正地過新曆除夕和元旦。透過

¹¹⁵ 〈新年及商業休息〉，《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1 月 2 日，第 4 版。

¹¹⁶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五）》，1922 年 1 月 1 日，頁 451；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1923 年 1 月 2 日，頁 2。

¹¹⁷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1921 年 12 月 30-31 日，頁 395-396；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1922 年 12 月 28、31 日，頁 432、435。

學校規訓，迫使家長不得不學習改曆，接受新曆年，並逐漸內化至生活作息當中。

1920 年代之後，從黃旺成的日記也可看到他和周邊朋友如何過新曆新年。舉例而言，1922 年 1 月 1 日，黃旺成原公學校的同事鄭元璧「去官舍投刺（名片）數處」；1 月 2 日，在新竹公學校任職的曾瑞堯則來黃家賀正。1922 年之後，黃旺成及其親友開始在新曆歲末互相送年；他到新竹望族陳信齋家，也「見其滿室積有贈年品物」，而說「新竹此風」最盛，此後，每年新曆歲末，他開始從俗送年。他的東家蔡蓮舫，自 1923 年年底亦於新曆歲末送年，不但請黃旺成代發「年末贈送」，且特地請雇人押送魚子、檳柑到基隆，寄天草丸船轉贈香港郭、陳兩家；該年歲末，黃旺成則是到張式穀家吃年糕，晚飯之後到錦珍香買「歲暮贈品」。¹¹⁸

1925 年之後，臺灣人過新曆新年的狀況，更加普及化。例如，嘉義地區是：

嘉義本島人間之迎新曆者逐年濃厚，如本年之元旦清晨，合與新曆舉祝，除上流階級者以外，中流及婦人亦改用新曆，故市中大小店鋪，盡行閉戶休業，爆竹聲響，……，男婦老幼悉著美麗服裝，或有面帶屠蘇酒氣手攜名刺迴禮者……。¹¹⁹

1926 年新竹地區也是：「本島人方面，或貼紅聯，或放爆竹。又廟宇寺院各點燈結綵，以為祝賀。」連黃旺成也指出 1925 年元旦，為他所居住的村莊第一次迎年，「雖無萬紫千紅，亦別有一種山家樂趣，兒曹侵晨即登校赴祝賀式。」¹²⁰ 由此可見，1920 年代中葉，城市及中、上階層已普遍過新曆新年，同時將舊曆年的活動嫁接至新曆年。不過，鄉村似乎仍是另外一番風景。1935 年，在臺南佳里執醫師業的吳新榮就說，「在這草地過這正月，全然不出氣分」；「休正的人大概是官吏、職員而已」。¹²¹ 一語道破 1930 年代中葉鄉村地區的臺人新曆年的實況。

¹¹⁸ 1922 年 12 月 29 日，黃旺成收到 4 位親友送來禮物，也回送年禮，這些禮品包括葡萄、檳柑、威士忌酒、葡萄酒、糖、香腸、斗柚、餅等；1923 年，則有罐頭魚；1924 年有魚子、醬油。顯然，送年的禮物新、舊禮品夾雜。參見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十一）》，1922 年 12 月 29 日，頁 433；1923 年 12 月 29-31 日，頁 438-441；1924 年 12 月 31 日，頁 406。

¹¹⁹ 〈市中賀客〉，《臺南新報》，1925 年 1 月 6 日，第 5 版。

¹²⁰ 〈兩婦人交禮會〉，《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1 月 7 日，第 4 版；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十二）》（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13），1925 年 1 月 1 日，頁 1。

¹²¹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輯，《吳新榮日記全集（一）》，頁 64-65。

另一方面，輿論和部分臺灣仕紳更積極鼓吹廢除舊正月（舊曆新年）。如 1922 年臺南市協議會議員余君屏、張作人及關廟街林英心，認為臺南地區臺人商店在舊曆元旦閉門休業，「與制度改正之旨趣、同化策之方針實屬相反」，提出廢止舊正月之議。在保甲事務所的協助之下，使一些商店不歇業，回禮也減少；北港街長蘇顯黎、各總代及公學校校長則通知各商店應停止舊正月元旦紀念日休息和回禮。1926 年，《臺南新報》也出現專文批評舊曆新年的缺點；¹²² 1929 年，就連唯一由臺灣人辦的報紙、民族運動的發聲筒《臺灣民報》社說，也「提倡實行國曆」，認為陰曆算法不精確，且「帶有異端的流弊和迷信的色彩」。¹²³

很明顯地，1920 年代的改曆不僅是初期官方透過地方基層公職人員執行同化政策而已，也有部分知識分子從文明化、科學化及追求世界潮流的角度來考量。不過，這些團體和輿論越是批評舊曆，提倡廢除舊曆元旦，越顯示舊曆年的固著。1922 年，《臺南新報》更一針見血地指出：新曆新年雖家家戶戶立門松、掛注連繩，但「不過外觀之形式，實則古曆年關一屆，稻艭各街及村落竟呈盛況，可見島人從來習慣，非容易一時可移也。」¹²⁴ 連臺北都如此，其他地區更遑多論。1923 年舊曆元旦，專賣局各工場和鐵道部工場甚至因大部分工人為臺灣人而不得不休假一天；¹²⁵ 1924 年《臺南新報》的記者即慨嘆：「島人有志，自數年來頻倡改用陽曆藉遵正朔，然新例著設，舊例莫除。」¹²⁶ 此後，雖有關舊曆新年的報導更少，臺人卻始終仍過舊曆年。

正因為臺灣人仍過舊曆新年，1920 年代之後，至少中、大型城市和中、上階層的臺灣人開始「兩度迎年」的新生活，且包括貼春聯、圍爐、送年、賀正、春酒、春宴、新年宴會、祭祖祀神、吃年糕、吹春以及到廟裡燒香拜佛等風俗習慣，混用於兩個新年，廟裡做戲、看電影¹²⁷ 或其他新式的娛樂活動，也同樣在兩個新年中交錯出現。此時臺灣人的日記，即清楚展現這樣的風貌。

¹²² 〈舊正月廢止實行〉，《臺南新報》，1922 年 1 月 28 日，第 6 版。

¹²³ 〈提倡實行國曆〉，《臺灣民報》，1929 年 2 月 10 日，第 2 版。

¹²⁴ 〈臺北通信：兩度迎年〉，《臺南新報》，1922 年 1 月 26 日，第 6 版。

¹²⁵ 〈臺北通信：舊正狀況〉，《臺南新報》，1923 年 2 月 18 日，第 5 版。

¹²⁶ 〈古曆元旦〉，《臺南新報》，1924 年 2 月 8 日，第 5 版。

¹²⁷ 電影約於 1900 年前後引入臺灣，但直至 1920 年代中期，隨著中國電影輸入，電影市場才大幅擴展，並朝向多元發展。詳見三澤真美惠，《「帝国」と「祖国」のはざま：植民地期台湾映画人の交渉と越境》（東京：岩波書店，2010），第一章。

如前所述，黃旺成自 1922 年起，為配合小孩而開始改曆，過新曆除夕和元旦；另一方面，他也過舊曆新年。1922 年上元燈節，其日記載明：「上元既過，新正氣象亦隨之而去，居停晚備春餅小酌者，亦惜別新正氣象之意也。」¹²⁸ 換言之，黃旺成和蔡蓮舫仍從舊曆過年，且持續新正月期間的各種活動。

再來看林獻堂如何過兩個新年。1927 年新曆元旦起，林獻堂開始寫日記，但沒有家裡過年的特別紀錄。至 1929 年元旦一早，林獻堂家 5 位子女來向他們夫婦行「元旦祝賀禮」，之後其他親友陸續來賀年；林獻堂也在 9 點半去公學校「參列祝賀式」，後與兒姪輩到 8 個地方「投恭賀新年名刺」，下午則去兄弟家賀正，也有其他親友來林家賀正。2 月 8 日，舊曆除夕前一天，林獻堂為「分贈歲暮之錢，忙了半天」；除夕日，他說「霧峰街買賣昨日與本日非常鬧熱」，下午 5 點拜祖先，晚上和家人一起圍爐；2 月 10 日，舊曆元旦，早上和家人共同拜祖先，之後一些親朋陸續來賀正，林獻堂又與家人到萊園拜祖母墓，再去二伯母和庶母處賀正，下午到大里祭拜父母墓，再往臺中伯母處賀正。¹²⁹ 1930 年新曆新年，林獻堂首度接到 110 餘枚的賀年卡。從該年開始，他在新曆年接到的賀年卡數量也逐年增加，到 1937 年元旦甚至高達 7 百餘枚。¹³⁰ 1930 年 12 月 31 日，林獻堂第一次在新曆除夕圍爐，並稱「內子備餽饌作過年」，承認新曆過年。不過，事實上林家很少在新曆除夕圍爐，也經常沒有特別的活動。1929-1935 年，¹³¹ 林獻堂家新曆新年主要是除夕全家聚餐，元旦參加官辦的新年祝賀儀式、有親友來賀正、偶而參加新年宴會以及收到越來越大量的賀年卡；相對地，舊曆新年反而更加熱鬧，且活動時間更長。例如，1930 年，林獻堂指出「每年舊曆元旦男女在萊園嬉春者約數百人」；1931 年，直至正月初四，尚有親友來賀正，初五則在家舉辦「婦女親睦會」、「醫學同級生會」，甚至「抽福引籤」，似乎有變更名目慶祝舊曆新年的意味。1932 年一早，「吹春之聲已嘹唳盈耳」，不得不起床，如常地祭祖、上墳，大批親友來賀正，開始在萊園拍家族合照，並到戲院看電影。此後，林家

¹²⁸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九）》，頁 56-57。〔按：居停指蔡蓮舫〕。

¹²⁹ 1928 年林獻堂的日記已佚失。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二）》（臺北：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近史所，2001），1937 年 1 月 1 日、2 月 8-10 日，頁 1、48-49。

¹³⁰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三）》（臺北：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近史所，2001），1930 年 12 月 31 日，頁 434；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九）》，1937 年 1 月 2 日，頁 3。

¹³¹ 1936 年林獻堂的日記已佚失。

人大致固定會在舊曆新年期間一起去看電影。1934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一新義塾更在舊曆過年停課，直至正月初六才恢復上課；十二月二十九日林獻堂也發「壓歲錢」與諸關係者；舊曆元旦，甚至有「賭錢者」被巡查逮捕。¹³² 由此可見，1929年起，林獻堂雖開始「兩度迎年」，卻仍以舊曆為重，所有傳統祭儀均在舊曆舉行，且形態最多元，新、舊文化元素互相交融。

至於張麗俊，直至1936年的最後一本日記，主要過舊曆新年和除夕；新曆新年則最多去投遞名片或參加官方舉辦的慶祝活動，且經常缺席。新曆除夕幾乎完全沒有特別活動；相對地，舊曆從除夕到元宵節，大抵都遵習俗，舊曆年期間，也常有朋友來邀春宴、遊春。¹³³ 1935年，吳新榮則說：佳里人「都是做舊正，而我們的生活已不能如此，所以我們一年過兩回的正月，而無一回可能使我們十分味了真正的醞釀味。」¹³⁴ 凸顯新一代知識分子必須兩度過年的感觸和無奈。

張麗俊、黃旺成、林獻堂及吳新榮，這些屬於臺灣中、上階層的仕紳和知識分子，直至1930年代中葉都還在過舊曆新年，且大致上每年兩度迎年，可以推知這是部分臺灣人過年的常態，農村則更普遍地僅過舊曆新年。臺人為何總無法廢棄舊曆、改過新曆新年，與其主要為農業社會，且過年的祭祖、祀神儀式攸關傳統文化習慣和價值，很難徹底改變，而儼然成為被殖民者無意識的文化抵抗。商人、農人以及漁民因按照農曆進行年中行事，因此一直是固著於農曆、最晚改曆的一群人。¹³⁵ 農人和漁民大約直到日治末期仍按照農曆行事，商人一時之間要改掉每年年終的計帳習慣，也頗為困難；1906-1936年，張麗俊始終在舊曆年

¹³²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三）》，1930年1月30日，頁33；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四）》（臺北：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近史所，2001），1931年2月20-21日，頁63-64；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五）》（臺北：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近史所，2003），1932年2月6日，頁59；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七）》，1934年2月9、12、14日，頁62、65、67。

¹³³ 例如，1936年舊曆除夕前一天，到市場買豬肉、物品，下午「在家清潔庭除」；除夕則「早起拜謝天神地祇，因完年也」，晚飯後發壓歲錢給家族人。元旦，仍如歷年一般，「早起祀神祖慶祝舊曆元旦」。吃完早齋之後，率家人去各寺廟燒香拜佛。正月初二，邀親友來晚宴；初五，還有朋友來賀新春，「因與遊春」。參見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九）、（十）》，1935年2月2-3日，頁542；1935年2月4-8日，頁3-4。

¹³⁴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輯，《吳新榮日記全集（一）》，頁65。

¹³⁵ 早在1898年，《臺灣日日新報》即指出：「農事播種、收穫及商船隨潮汐往來，慣用舊曆節氣。」1913年又載：「文明之今日，尚遵用舊曆者，本島人而已。一部受新教育人士，雖欲實行新曆，終以調高和寡。」1917年，嘉義地區也「商家終以年度收帳關係，循行舊曆。」參見〈臺俗除歲〉，《臺灣新報》，1898年1月22日，第1版；〈舊曆年終商況〉，《臺灣日日新報》，1913年2月6日，第6版；〈嘉義舊曆元旦〉，1917年1月26日，第6版。

前後核算一年的帳務。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霧峰林家的林瑞騰，從 1912 年效法中國推行改曆，開始實行新曆，但卻自 1933 年元旦起又改奉舊曆。¹³⁶ 林瑞騰的例子，事實上反映了另一種臺灣人知識分子改曆的心路歷程，以及 1930 年代之後，部分臺人有意識地以改回舊曆作為殖民地人民文化抵抗的策略。

總之，1919 年代之後，在總督府揭櫫同化政策之大旗後，警察和街庄長的倡導、同風會的推行及學校的規訓之下，新曆新年的作息已逐漸內化至部分臺灣人的生活當中；1925 年後更普及至中、大型城市和街庄，或至少中、上階層及知識分子家庭。不少臺人每年「兩度迎年」，新、舊過年的文化元素也經常互相交錯和嫁接，甚至加入各種新式、現代化的活動和娛樂；這也意味著，原先打著內地延長主義、企圖完全廢除舊曆新年的殖民政府，最後功敗垂成，連新曆新年都得妥協地採用中、日式風俗、習慣交雜的模式，而未完全日本化，可說是為先達到被殖民者改曆、遵奉日本正朔的目標，而不得不採取「不完全同化」的文化改造策略。

五、皇民化的抑制：

臺灣人的抵抗與舊曆新年的隱形（1937-1945）

1936 年 9 月，海軍大將小林磯造就任第 17 任臺灣總督，一上任即揭櫫「皇民化」為三大治臺方針之一；隔年 7 月，中日戰爭爆發後，殖民政府積極推動皇民化運動。此運動實為同化主義的極端形式，也是日本帝國戰爭動員的一環，目的係改造殖民地人民成為「真正的日本人」，亦即徹底的「日本化運動」。¹³⁷

在這種時代氛圍下，「廢舊正月」以達到「國民生活一元化」，逐漸蔓延至全臺各地。1937 年 12 月，鹿港街即在公會堂聚集方面委員、教化委員、區總代、振興委員、組合長等約 1 百名，成立「國民精神總動員協議會」，決議廢止舊正月；之後，埔里街、基隆瑞芳庄亦先後發起「廢舊正」活動，瑞芳庄甚至高達 3 千人齊聚公會堂，以致幾無立錐之地。1938 年 1 月，彰化市、北斗郡也跟進，警告在舊正月張貼門聯者，且主張各銀行、會社及工場不應給予舊曆元旦上班者補

¹³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六）》，1933 年 1 月 1 日，頁 1。

¹³⁷ 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臺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1937-1945）〉，頁 35-36。

假和額外津貼；北斗郡守田部貴、庶務課長筒井諒庸及警察課長上野茂譽，企圖在舊曆除夕獎勵全郡人民大掃除，元旦當天修繕道路。竹東地區，則更積極地廢止舊正月的「廟詣り」（燒香拜佛）和「親族訪問」（賀正）活動；中壢郡生活改善會決定，在各部落開講習會，舉郡廢止舊曆。¹³⁸ 基隆郡礦區的勞工往往於舊曆新年期間回鄉一或二週過節，1940年在「鑛業報國的時局」下，鑛業報國助成會從正月初二開始，舉辦一週的鑛業增產安全週，極力防止勞工回鄉，甚至威脅將處分違規者，並在各派出所召開保甲會議、家長會宣傳；蘇澳郡也動員保甲和工場，在舊曆新年期間實行「勤勞報國週」，讓勞工繼續工作。¹³⁹ 由此可見，1937年起新一波的舊曆元旦廢止運動，主要由郡市街庄的基層人員或民間團體發動，不僅更激進地主張廢除原舊曆新年一些具代表性和象徵意義的固有習俗，且不惜恫嚇臺灣人勞工，以期達到舊曆新年繼續勞動的目標。

在皇民化運動的旗幟之下，地方基層組織之積極推動，是否可真正廢除舊正？根據記者的追蹤報導，臺灣人一到舊曆過年，肉豬的需求特別高；1938年新年前後三天，彰化市宰殺豬隻450頭，雖比1937年的6百頭少，卻遠高於平日的50頭，由此可見，彰化市民仍相當程度地繼續在過舊曆新年。基隆市雖說在保甲協會的努力之下「收好成績」，幾無外出娛樂者，但賭博情況卻依然相當盛行。¹⁴⁰ 1939年，《臺灣日日新報》又報導如下：

1月29日是舊曆新年，正逢星期日，天氣又好。……大稻埕、萬華本島人密集的區域，各商店大多休業。從早上開始，穿美衣的男女湧現在街上。往北投的臨時火車、巴士，更不要說市內巴士、各電影院都客滿。廢止舊曆新年的宣傳效果，毫無顯現。只是沒有看到非常喧噪的爆竹和紅色的門聯。¹⁴¹

¹³⁸ 〈地方近事 埔里：旧正月廢止〉，《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12月18日，第8版；〈舊正月を廢止：基隆瑞芳庄の陋習打破〉，12月24日，夕刊第2版；〈舊正月を廢止せよ 彰化市で再通牒〉，1938年1月24日，第5版；〈舊正は絶対に廢止 各街庄に再び通達〉，1月30日，第5版；〈郡民が總出動し 道路の美化作業：徹底的に舊正を廢止〉，1月31日，第5版；〈舊正を廢止：竹東の皇民化徹底〉，2月4日，第5版；〈舉郡、舊曆廢止：各部落で講習會を開いて徹底 中壢生活改善會で決定12月14日〉，第5版。

¹³⁹ 〈舊正休みを防止し 基隆郡下で鑛業增產週間〉，《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2月2日，第7版；〈舊正は絶対廢止：偷安を恐れ勤勞報國週間實施 蘇澳郡保甲民の皇民化〉，2月5日，第4版。

¹⁴⁰ 〈本島人全戸の生活改善調査：舊正に彰化市で〉，《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1月31日，第5版；〈賭博だけは 相當に多い：基隆の舊正月〉，2月2日，第7版。

¹⁴¹ 〈「舊正」廢止どころか 島都是物凄い人出！皇民化の見地から一考を要す〉，《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2月20日，第7版。

連臺北地區都如此，可想而知臺灣各地大概都是陽奉陰違，南投街、新竹竹東郡即有類似現象之報導。¹⁴² 1938年，吳新榮的日記也記載：「雖然大呼要廢掉舊曆，但在鄉下生活的人豈能夠輕易地忘卻數千年來的習慣嗎？」，一大早菜販在市場成群叫賣，晚上很晚了，理髮廳還是客滿。「大年夜的氣氛瀰漫在街上，甚至往來行人的毛髮裡。」¹⁴³ 他甚至進一步批評殖民政府的強力壓制：

打破迷信、革新政策，本來一直是我們所贊成、主張的，但是我們對於這段期間所採行的強制手段和愚民政策無法認同。我們只認同時勢的力量。不捨去老舊的東西的話，無法換來新的。……我們期望加速進化的步調。¹⁴⁴

皇民化下極力抑制臺灣傳統的節慶生活，反而招來支持文明化、科學化的知識分子反感和批判，更促使他們有意識地堅守舊曆新年文化來抵制殖民統治。

然而，戰爭時期全民精神總動員下的勵行改曆和廢舊正活動，仍有一定的效果。如臺灣人已逐漸不能在舊曆新年光明正大地燃放爆竹、張貼門聯、燒香拜佛以及賀正，新年的各種活動朝向隱形化。就連林獻堂這樣的臺灣人民族運動領袖也受到改曆的影響。

中日戰爭開始之後的前三年，林獻堂大部分時間都避居東京，¹⁴⁵ 戰爭前、後的過年境遇也大相逕庭。戰爭之前，1937年舊曆元旦，清晨5點他已被「吹春之聲」叫起，之後，依慣例參拜祖先、祭墓，也與親友互相拜年；正月初四，還在萊園舉辦「觀梅會」，且有親友來賀正，大家一起在還翠廬「抽福引」。1938年舊曆新年，他已避居東京，只能一早「向西南遙拜祖先」，但接到妻子楊水心的來信云：「吾鄉皆改用新曆，今朝為舊曆元旦，不知從來之行事皆廢否？」¹⁴⁶ 之後，自1938年開始，林家正式改曆，12月31日第一次在新曆除夕參拜祖先。1939年新曆新年，林獻堂不僅像舊曆新年一般，一早全家參拜祖先，且到兄嫂家賀正；

¹⁴² 〈陋習の改善は容易でない：舊正月に肉の値上り〉，《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2月21日，第5版；〈地方近事 竹東：舊正を迎へ非常な雑踏〉，3月1日，第8版。

¹⁴³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輯，《吳新榮日記全集（二）》（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頁198。

¹⁴⁴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輯，《吳新榮日記全集（二）》，頁206-207。

¹⁴⁵ 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一九二〇～一九五〇》（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230。

¹⁴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九）》，1937年2月11、14日，頁57、63；《灌園先生日記（十）》（臺北：中研院臺史所、近史所，2004），1938年1月31日，頁35。

1月2日，全家到臺中祭宗廟。開祭前，揭揚國旗、合唱國歌、遙拜皇居，全部改為日式典禮，林獻堂並明白地記下：「以上皆係去年所改易也」；宗廟收支報告會時，甚至決議因宗廟改用「神官祭禮之故」，將祭祀日期由舊曆改為新曆。1940年新曆新年，林獻堂還做「除夕感懷」和「元旦」七律兩首；1月2日也接到親友寄來的魚子、椪柑以及香腸；1月1-5日，陸續有親友來賀正。¹⁴⁷ 祭宗廟、賀正以及送年，顯然已改到新曆年進行。

儘管開始改曆，同年（1938）舊曆除夕，林獻堂仍「如例」同家人參拜祖先、圍爐飲酒；元旦也跟往常一樣，參拜祖先，祭祖母、父母墓，到臺中看兄嫂，參拜宗廟，去柳屋晚餐，到臺中座看電影。但是，從該年開始，林獻堂的日記於舊曆年間不再用「賀正」一詞，也幾乎沒有人到家裡拜年，即使有人來，也不說是賀正。他還特別指出，除夕當日去後樓詢問阿麵，「欲再過舊曆之新年乎」？阿麵則回答「警察壓逼甚嚴，不敢再作舊曆，欲往臺中與其兒女度此殘臘」。¹⁴⁸ 顯然，在警察和街庄保甲系統的監控下，1939年之後，廢舊正仍達到一定形式上的效果；1940年代後，林獻堂家舊曆新年期間也越來越沒有特別的活動。

多數的臺灣人大約像林獻堂一般，各自有因應策略，將舊曆新年儀式隱形化，舊曆年成為另一個殖民地人民文化抵抗的場域；也因此，直至1940年舊曆新年，臺南市和嘉義市因尚有一部分人未徹底廢舊正，而召集保甲會議，重申「絕滅舊正行事，實踐臣道」。官方雖一再施壓、不斷重申，不少臺人仍繼續過舊曆新年。這一年，臺北州於過年期間查獲賭博案件15件，64人被捕；大稻埕、萬華的臺灣人商店街也休業，甚至比1939年還多。難怪連《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者都不得不指出，雖然廢止舊曆正月之聲非常高昂，但仍可看到臺人進行舊曆儀式。¹⁴⁹ 隔年皇民奉公會成立後，遂又再度掀起新一波徹底廢舊正運動。

¹⁴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1938年12月31日，頁343；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一）》（臺北：中研院臺史所、近史所，2006），1939年1月1-2日、2月21日，頁1-3、84；林獻堂著、許雪姬、張季琳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二）》（臺北：中研院臺史所、近史所，2006），1940年1月1日，頁1-2。

¹⁴⁸ 直至1945年舊曆新年，林獻堂才又提及有4人來賀正。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一）》，1939年2月17-19日，頁78-81；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七）》（臺北：中研院臺史所、近史所，2010），1945年1月1-2日，頁1、5。

¹⁴⁹ 〈舊正は斷禁：臺南署で絶滅を期す〉，《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1月23日，第4版；〈舊正は嚴禁〉，1月25日，第4版；〈遺憾なる光景〉，1月28日，夕刊第2版。

1941年4月，配合日本母國「大政翼贊會」的組成，殖民地臺灣成立「皇民奉公會」，本部在臺北，又於各州、郡、街、庄成立支部，最基層的組織則是「奉公班」和鄰組，成為臺灣各民間團體的指導和統轄機構。亦即透過層層相扣的專責機構和相關人員進行日、臺人的全面性社會動員，以完成既定的政策目標。¹⁵⁰ 皇民奉公會既負責社會動員，且隨著戰爭戰線的擴大，更提倡戰時物資節約，極力執行廢舊正。1943年舊曆元旦之前，皇民奉公會新竹支部誓言，今年一定一掃舊正、年末年始之停工、「遊食之弊風、金錢浪費之惡習」；1944年1月，臺北州也宣稱必須打破舊正慣習，「戰力增強皆勞動週」，而要求各職場一起展開「舊正廢止皆勞動大運動」，以「激勵產業戰士」。¹⁵¹ 其成效如何，雖未有進一步的報導，但直至1945年日本戰敗，林獻堂家仍如例每年舊曆除夕圍爐、祭祖，元旦也照常祭祖、上墳。1943年2月，林獻堂的日記更載明：「本島人大多過舊曆，申甫引奉公會及教育課之人來觀鄉村過年之狀況。」¹⁵² 1944年舊曆除夕，吳新榮也仍到許天成家參加「舊曆年末的小宴」，但「顧慮著時局，只能在三樓的小閣樓，節制地過了兩三小時」。¹⁵³ 進言之，太平洋戰爭之後，主張廢舊正，已不再僅是為文化改造，更著眼於戰時物資節約和產業勞力；然而，其是否可完全達到絕對的廢止舊正、生活一元化，仍值得懷疑。知識分子和上層仕紳尚且在過舊曆新年，農村則仍大部分使用舊曆、過舊曆年，甚至指稱新曆新年為「日本人的新年」。¹⁵⁴

另一方面，戰爭時期，臺灣人則更嚴厲地被迫過新曆年。由於現代戰爭是一種總體戰，亦即結合武力、資源以及思想的綜合作戰，強化思想的戰爭宣傳也是最有力的戰爭武器。¹⁵⁵ 新年儀式和活動於是成為皇民精神動員和戰爭宣傳的最

¹⁵⁰ 許雪姬，〈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1（1999年6月），頁167-211。

¹⁵¹ 〈貫かう！百年戦争：奉公運動實踐要綱決る〉，《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1月22日，第4版；〈必勝増産へ舊正月は返上：舉州皆勞へ總突撃〉，1944年1月25日，夕刊第2版。

¹⁵²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五）》，1943年2月5日，頁57。

¹⁵³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輯，《吳新榮日記全集（七）》（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頁378。

¹⁵⁴ 2012年10月21日訪問大正（1912-1926）年間出生的徐瀛洲先生，他指出由於家裡務農，直至日治末期都是過舊曆新年。林玉茹訪問、記錄，〈徐瀛洲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2012年10月21日，於臺南。現年71歲的林添旺先生也說，小時候聽受過日本公學校教育的母親說，新曆新年是「日本人的新年」。林玉茹訪問、記錄，〈林添旺先生、林王金桂女士訪問紀錄〉（未刊稿）。2013年2月，於臺南市訪問現年86歲、曾擔任海軍志願兵的黃先生，也說他們家僅過舊曆年。林玉茹訪問、記錄，〈黃玉珍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2013年2月23日，於臺南。

¹⁵⁵ 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一九二〇~一九五〇〉，頁225。

佳時機，其儀式也隨著戰爭形勢的轉變，而強烈帶有效忠天皇、軍事化的色彩；又，為物資節約，部分日式的新年儀禮也不得不暫時廢除。

首先，新年祝賀會的規模更大，儀式逐漸加入戰爭元素，不僅擴及偏遠村莊，部分地區甚至直接強迫參加。例如，1939年元旦，臺南市官民共同舉辦的新年祝賀儀式，改在臺南神社舉行，官民共2千餘名；除了原來的儀式之外，特別加上宮城遙拜，對出征戰士祈禱武運長久，為英靈默禱，喝冷酒。連臺南州偏遠的北門庄、新竹大湖、花蓮鳳林均有相關報導，鳳林庄甚至要求「各官公吏各團體之外，各戶一人參列」。¹⁵⁶ 太平洋戰爭之後，更經常直接要求各奉公班和家庭參加新年祝賀典禮。舉例而言，1942年元旦，臺北地區廣播各奉公班和家庭參加在「大東亞戰爭」意義深刻下的新年祝賀典禮；高雄全市各奉公班則在神社或鄰近空地開「元日常會」；屏東由皇民奉公會屏東支會主辦新年交禮，官民2千人參加；嘉義也大概類似，1千數百人參加。由於規模擴大，經常不是在神社就是公園舉行。¹⁵⁷ 隨著戰爭局勢越趨不利，皇民奉公會和奉公班也在各地的新曆新年活動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1944年元旦一早，高雄市民即著決戰服，參拜高雄神社，奉公班則主辦新春常會；1月2日，青少年團進行全團員緊急召集，男子團員行軍、女子團員做體操；嘉義市內各奉公班則主辦歲旦「必勝祈願常會」、市役所、官衙、學校、銀行、會社、組合、工廠均舉行「御真影」奉拜式和祝賀式。¹⁵⁸

新曆元旦參拜神社也更加普及至各重要街庄。早在1934年，因應時局之緊迫，臺灣總督府提出「一街庄一社」的神社建立方針，並擬以神社為社會教化中心。¹⁵⁹ 至1945年，新建神社達43所，大致分散在臺灣西海岸各州樞要的市街庄，幾乎已達到「一郡一社」的地步，¹⁶⁰ 因此全臺重要城市、街庄於新曆元旦

¹⁵⁶ 大湖庄公學校舉行「拜賀式」，公會堂則有名片交換會。〈神鼓の音響き：參詣者で埋めらる各街庄では盛んな体育會〉，《臺灣日報》，1939年1月3日，第2版；吉田駿馬，〈年頭の辭〉，1月6日，第4版；〈各地政始式〉，1941年1月5日，第2版；〈地方近事 鳳林：新年祝賀式〉，《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1月9日，第8版。

¹⁵⁷ 〈各地新年行事〉，《臺灣日報》，1942年1月2日，第2版；〈各地の元旦〉，1月3日，第2版。

¹⁵⁸ 〈必勝の決意新たに：島内各地の正月諸行事〉，《臺灣日報》，1944年1月4日，第3版。

¹⁵⁹ 1935年之前，臺灣總督府公認的神社有25所。參見蔡錦堂，〈日治時期日本神道在臺灣的傳播與侷限〉，《淡江史學》12（2001年12月），頁146。

¹⁶⁰ 1935年新建神社4所，1936年7所，1937年7所，1938年6所，1939年和1940年各4所。參見蔡錦堂，〈日本治臺時期的神道教與神社建造〉，頁24。

到神社參拜也漸成慣例，不少地方甚至要求各家庭應參加或至少派一人參加。1939年，臺中州和臺北市均發出通牒，要求各家庭元旦早上務必到神社參拜；各地如岡山神社、東石神社、苗栗神社均公告新年行程，鼓勵民眾參與。參拜神社儀式的規模也更為擴大，且隨著戰爭局勢的激化，其中的戰爭色彩越加濃厚。1941年元旦，臺灣神社參拜者達5萬4,000人，「比之歷年，為破紀錄」；1942年，從官衙、學校、青年團到奉公班等，自除夕夜開始為祈禱「聖壽無窮、皇室彌榮、國運隆昌」、「大東亞戰爭（太平洋戰爭）必勝、皇軍武運長久」以及英靈之冥福，到臺灣神社祈願者達十數萬。連基隆神社1940年的參拜人數都已達到2萬人。¹⁶¹

不過，由於戰爭的特殊時局，為強調物資節約，1939年之後一些原有活動陸續被取消或式微。臺東、花蓮港街即通知市民，廢除年末年始的贈禮、回禮、賀年卡、門聯等儀式，忘年會和新年會則需「節制」（自肅）；嘉義市「廢止一般迴禮，各戶安靜地祝福戰捷的新年」；臺北、高雄等地，大致相同，賀客往來漸少。新年宴會也逐漸廢除，而將宴會費用改為節約獻金。有趣的是，1941年，臺中州卻因禁止回禮，結果到臺中座娛樂館看表演的人很多，或帶兒童去郊外野餐、公園及遊樂區者變多；部分街庄則於新春期間，舉辦體育會。¹⁶² 之後，隨著戰爭局勢惡化，連新年年假也被取消。至1944年元旦，決戰的一年，吳新榮更指出：「一切都沈靜空寂，連年初的新年慶祝會都沒了」，但他為了讓孩子們高興，仍按往例全家一起拍照，搭巴士到臺南玩；1月2日，還去參拜臺南神社、孔子廟，也想去教育博物館，但卻休館。¹⁶³

皇民化運動下積極推動新曆新年及長期學校教育的教化，顯然仍成功地讓不少臺灣人，特別是城市居民、接受新式教育者逐漸將新曆新年內化成固定的年度

¹⁶¹ 〈舊曆迎年是絕對廢止 迴禮は元旦に限る：臺中州の新年行事〉，《臺灣日報》，1939年12月12日，第4版；〈臺北市的新年行事〉，12月24日，第4版；〈各地新年行事〉，12月31日，第4版；〈各地新年行事〉，1942年1月2日，第2版；〈基隆神社の參拜者二萬〉，《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1月3日，第7版；〈例年の初指にし 記録破りの參拜者：元旦の臺灣神社社頭〉，1941年1月7日，第3版。

¹⁶² 〈各地の正月〉，《臺灣日報》，1939年1月3日，第2版；〈神鼓の音響き：參詣者で埋めらる各街庄では盛んな體育會〉，1月6日，第4版；〈お正月は自肅 物資を節約し貯蓄勵行 臺東廳時局對策委員會で決定〉，12月14日，第4版；〈元旦の酒は屠蘇程度に止めよ 臺北南署館内の自肅〉，12月15日，第4版；〈臺中小觀〉，1941年1月5日，第3版；〈新年宴會節約獻金：海軍武官府に渦巻く島民の赤誠〉，《臺灣日日新報》，1942年1月8日，第3版。

¹⁶³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輯，《吳新榮日記全集（五）》（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頁291；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輯，《吳新榮日記全集（七）》，頁378。

節慶生活。學校教育的規訓尤其重要。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前，日本政府注意到學校教育的滲透極有助於社會動員，而在政策上更有意識地和嚴密地推動。學校和學生數量也明顯增加，1943年就學率高達71.3%。受教育人口不斷增長，且大多能完整地完成初級教育的課程，已促使新一代的臺灣青年自然地接受全新的生活規律與時間制度。¹⁶⁴ 1943年新曆元旦，呂赫若的日記也記載：

今天是元旦，多數本島人也在今天過新年。在二樓陽臺眺望過往行人。為了想過得像個新年，等愛治、愛琴從學校回來後，在十點左右帶全家徒步去臺灣神社，順便去遊樂園小憩。¹⁶⁵

由上可見，呂赫若也認為日治末期，大多數的臺灣人已過新曆新年，而參拜神社、去遊樂園，才可「過得像個新年」。他稱新曆12月31日為除夕，當天家裡做年糕、「圍坐」（圍爐）；1944年元旦，還參加公司的新年團拜，之後與諸文友一起像日本人新春喝屠蘇酒一般「大喝美酒」，且直至1月3日仍是休假日。相對地，1943年2月4日，他雖然特別註記「舊曆十二月三十」，2月5日註明「舊曆正月元旦」，卻沒有任何慶祝活動。¹⁶⁶ 新一代的知識分子，顯然已完全接受日本殖民政府規訓下新曆新年的生活規律和活動，甚至逐漸接受廢舊正的教化；特別是城市和較積極採行改曆的街庄，臺灣人大多僅過新曆新年，而不再過舊曆年。也因此，1940年代之後，開始出現不少舊曆風俗的採集紀錄。1940年11月，日本民俗研究者池田敏雄（1916-1981）即在艋舺的一戶民家記錄「年中行事」一年，採訪這些已「被廢」的風俗；¹⁶⁷ 1941年，潘迺禎的〈士林歲時記〉，記載舊曆初一到十五的新年活動，但一開始即說明這是過去士林地方的「年中行事」，近年為生活改善、因應時勢，不再進行者已相當多，因而必須留下資料。¹⁶⁸ 此外，鄉村地區也因戰時的配給制度不得不過新曆年。1941年1月3日，吳新榮指出，「在鄉下，因為實施砂糖和白米配給制度，不得已只好過新曆的新年，不過還

¹⁶⁴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頁82-83。

¹⁶⁵ 呂赫若著、鍾瑞芳譯，《呂赫若日記》（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4），1942-1944年中譯本，頁267。

¹⁶⁶ 呂赫若著、鍾瑞芳譯，《呂赫若日記》，1942-1944年中譯本，頁286。

¹⁶⁷ 末成道男編，《池田敏雄臺灣民俗著作集》（東京：綠蔭書房，2003），上卷，頁315-328。

¹⁶⁸ 潘迺禎，〈士林歲時記〉，《民俗臺灣》6（1941年12月），頁8-9。

是蠻熱鬧」。¹⁶⁹

總之，在戰時體制之下，新、舊曆元旦的競爭更趨白熱化，促使部分臺灣人，特別是城市中的居民和接受新式教育的青年，逐漸選擇新曆新年而不再過舊曆新年。但是，另一方面，即使在警察、保甲系統以及皇民奉公會的嚴密監控下，大部分、特別是農村中的臺人，大約仍持續過舊曆新年，只是將部分過年儀式隱形，而呈現另一種殖民地人民堅守傳統節慶風俗或文化抵抗的精神。這也是為何戰爭一結束，臺灣人即歡天喜地地過舊曆新年，新曆年反而乏人問津。¹⁷⁰

六、結論

從清末到日治時期，在自然調適和殖民國家的規訓之下，臺灣人過新年的模式很明顯地呈現階段性的變容，反映被殖民者節慶文化的固著性、調整及抵抗精神。從清末到大正初年，臺灣人舊曆新年期間的風俗大致相同，僅有些微變化；1908年以前，臺人大多僅過舊曆新年，只有奉職於官衙者和學校的學生參與殖民政府引入的新曆新年活動。1909年，日本政府宣布廢除太陰曆之後，雖基於舊慣溫存的治臺方針，繼續讓臺人過舊曆新年，卻也開始漸進地推動過新曆新年。

大正初年開始，先從學校教育著手，嘗試要求臺灣人師生於舊曆年間照常上課。1916-1917年，地方基層人員和部分紳商組織同風會和改曆會推動改曆，尤其一些知識分子更基於中國改曆、嚮往近代文明的心情，支持改曆。此時的改曆，在地方官廳的主導下，首度帶有廢除舊曆元旦的企圖，而將其風俗直接嫁接至新曆新年；部分臺人因此開始接納新曆年，參加新年祝賀典禮、門前插國旗、門松以及掛稻草繩，但更多人卻是在地方官威逼之下，表面奉從、「聊應故事而已」，回到家大多沒有特別活動，繼續過舊曆新年。加以此時學校教育就學率仍低，時間制度的規訓才剛展開，效果有限，因此1910年代後期，只能說是在同風會和

¹⁶⁹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輯，《吳新榮日記全集（五）》，頁151。

¹⁷⁰ 1947年1月1日吳新榮即說：無新正的氣氛。但舊曆除夕日卻是：「光復變為復古了，大部分的百姓都準備歡迎舊曆」，在這農村當然要做這舊慣，市面也呈出盛況，物價空前膨脹。「致使我們已不能做新，也不能做舊」，但是至少蒸些甜粿敬祭祖先。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輯，《吳新榮日記全集（八）》（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頁347。

改曆會「文明化」、「改良民俗」以及「同化」的號召下，部分臺灣人開始嘗試過新曆新年，而很難如顏杏如所言，已經普及化。

1919年，臺灣進入文官總督統治時期，治臺方針改為內地延長主義，推行同化政策。在此新氛圍之下，改曆不僅是臣服的象徵，同時也是「同化的第一步」，地方官廳更積極地進行改曆。在同風會和地方保甲的極力推動下，1920年代中期，各大、中、小型城市，或中、上階層的家庭，以及一些婦女大約已在過新曆新年，商店也於新曆年間休業。不過，為了讓臺灣人能徹底改曆，包括張貼門聯、燃放爆竹、吹春、祭神拜祖、到寺廟燒香拜佛、炊年糕、寺廟撞鐘等傳統舊曆新年的習俗，也直接嫁接至原來的日式儀禮當中，而呈現新、舊，日、臺，甚或傳統、現代文化元素混融的殖民地新曆新年特殊風光。殖民地政府對於節慶文化的規訓，最終顯然妥協地採取「不完全同化」之文化改造策略。另一方面，由於臺灣人仍過舊曆新年，1920年代之後，至少中、大型城市和中、上階層的臺人開始「兩度迎年」的新生活，且臺、日和新、舊新年文化元素混用於兩個新年，廟裡做戲、看電影或其他新式的娛樂活動也同樣交錯出現在兩個新年之中。新、舊新年加入西式的娛樂活動，則展現1920年代之後臺灣人節慶文化現代性之啟動。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在戰時體制下實行國民精神總動員，推動皇民化運動。此乃極端的同化主義，廢除舊曆正月成為重要的政策目標，地方官廳遂透過民間團體、地方基層組織更加激進地執行。1941年，甫成立的皇民奉公會成為社會教化的指導機構，也試圖徹底改造臺人文化，以成為效忠天皇的帝國臣民；之後隨著戰線的擴大和戰局的逐漸逆轉，物資節約和戰爭勞力需求成為「廢舊正」的新動力。而在地方基層機構和皇民奉公會組織的監控之下，1939年起，大多數的臺人雖然仍繼續過舊曆年，但儀式逐漸隱形化，至少已看不到賀正、燃爆竹以及貼門聯的現象。另一方面，新曆新年祝賀典禮成為戰爭宣傳的最佳時機，儀式強調效忠天皇、祈禱武運長久，戰爭元素越發彰顯；加以1934年之後，臺灣總督府推行「一街庄一神社」運動，神社成為各郡新年教化中心，新曆元旦參拜神社的規模越發擴大，軍事化色彩也越趨濃厚；又為節約物資，包括貼門聯、燃爆竹、賀正、回禮、寫賀年卡及新年宴會等新、舊曆新年原有的節慶風俗也逐一被廢除。

1940年代，皇民化運動和學校教育規訓的結果，不少城市及新一代的臺灣人已將新曆新年內化至節慶文化當中，甚至不再過舊曆年。然而，另一方面，直至1943年，各州廳仍一再重申徹底「廢舊正」，很明顯地，大多數、特別是居住在農村的臺灣人，由於固有的舊曆從業習慣、祀神祭祖的文化傳統和價值，仍持續在過舊曆元旦；部分知識分子則因殖民地政府的強力壓制，反而有意識地改奉舊曆、過舊曆年來進行抵抗。儘管大多數的臺人必須像林獻堂一般將一些儀式隱形，如不再貼門聯、燃爆竹、到處賀正，但仍私下過舊曆新年，這種現象不僅反映傳統節慶文化的固著性，且似乎也隱含著殖民地人民另一種文化抵抗的精神。

引用書目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日報》

《臺灣民報》

《臺灣新報》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臺南新報》

林玉茹訪問、記錄，〈徐瀛洲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2012年10月21日，於臺南。

林玉茹訪問、記錄，〈林添旺先生、林王金桂女士訪問紀錄〉（未刊稿），2012年11月4日，於臺南。

林玉茹訪問、記錄，〈黃玉珍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2013年2月23日，於臺南。

三澤真美惠

2010 《「帝国」と「祖国」のはざま：植民地期台湾映画人の交渉と越境》。東京：岩波書店。

毛一波

1964 〈臺灣的新年〉，《臺灣風物》13(7): 3-5。

王世慶

1967 〈閩臺農曆過年的禮俗〉，《臺灣風物》17(5): 37-40。

1991 〈皇民化運動前的臺灣社會生活改善運動：以海山地區為例(1914-1937)〉，《思與言》29(4): 5-63。

末成道男（編）

2003 《池田敏雄臺灣民俗著作集》，上卷。東京：綠蔭書房。

吉田駿馬

1939 〈年頭の辭〉，《臺灣日報》，1939年1月6日，第4版。

成田龍一

1999 〈近代日本的「とき」意識〉，收於佐藤次高、福井憲彦編，《ときの地域史》，頁352-385。
東京：山川出版社。

宋光宇

1995 〈過新曆年？還是過舊曆年？：日據時代的「曆法改正」及其社會文化意義〉，《歷史月刊》85: 41-47。

辛永清（著）、劉姿君（譯）

2012 《府城的美味時光：臺南安閑園的飯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吳文星

1992 《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輯）

2007 《吳新榮日記全集（一）》。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2008 《吳新榮日記全集（二）、（五）、（七）、（八）》。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余文儀

1962(1774) 《續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21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沈茂蔭

1962 《苗栗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59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呂紹理

1998 《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呂赫若（著）、鍾瑞芳（譯）

2004 《呂赫若日記》，1942-1944年中譯本。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

林玉茹、劉序楓（編）

2006 《鹿港郊商許志湖家與大陸的貿易文書（一八九五~一八九七）》。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林百川、林學源

1960 《樹杞林志》，臺灣文獻叢刊第63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

2000 《灌園先生日記（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主編）

2001 《灌園先生日記（二）》。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主編）

2001 《灌園先生日記（三）》。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主編）

2003 《灌園先生日記（五）》。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主編）

2003 《灌園先生日記（六）》。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林獻堂（著）、許雪姬、張季琳（主編）

2006 《灌園先生日記（十二）》。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

2001 《灌園先生日記（四）》。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2004 《灌園先生日記（七）、（八）》。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2004-2010 《灌園先生日記（九）~（十一）、（十五）~（十七）》。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周婉窈

2003 〈從比較的觀點看臺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1937-1945）〉，收於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頁32-75。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周 璽

1962(1836) 《彰化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5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倪贊元

1959 《雲林縣採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37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高拱乾

1960(1696) 《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65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連 橫

1962(1920) 《臺灣通史》，臺灣文獻叢刊第 12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董天工

1961(1753) 《臺海見聞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129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皇民文庫刊行會（編纂）

1943 《徵兵制に備へる：臺灣皇民讀本》。臺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

2010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新版）》。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許雪姬

1999 〈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1: 167-211。

2000 〈張麗俊先生《水竹居主人日記》的史料價值〉，收於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 1-5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臺中縣政府文化局。

2000 〈《灌園先生日記》的史料價值〉，收於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一）》，頁 (1)-(17)。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許雪姬（主編）

2008 《黃旺成先生日記（一）~（二）》。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嘉義：國立中正大學。

2009 《黃旺成先生日記（三）~（五）》。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

2010-2013 《黃旺成先生日記（六）、（八）~（十二）》。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黃叔瓚

1957(1724) 《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黃昭堂（著）、黃英哲（譯）

2002 《臺灣總督府》。臺北：前衛出版社。

張人傑

2006 《臺灣社會生活史：休閒遊憩、日常生活與現代性》。臺北：稻鄉出版社。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解讀）

2000-2004 《水竹居主人日記》（一）~（五）、（九）、（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臺中縣政府文化局。

陳培豐（著），王興安、鳳氣至純平（編譯）

2006 《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陳翠蓮

2008 《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一九二〇~一九五〇》。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曾士榮

2010 〈黃旺成日記：跨越不同政權與世代的日記〉，收於許雪姬主編，《日日是好日：臺灣日記特展手冊》，頁 24-25。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楊聯陞

1983 《國史探微》。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59 《安平縣雜記》，臺灣文獻叢刊第52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59 《嘉義管內採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58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潘迺禎

1941 〈士林歲時記〉，《民俗臺灣》6：8-16。

蔡振豐

1959 《苑裡志》，臺灣文獻叢刊第48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蔡錦堂

2001 〈日本治臺時期的神道教與神社建造〉，《宜蘭文獻雜誌》50：3-32。

2001 〈日治時期日本神道在臺灣的傳播與侷限〉，《淡江史學》12：141-153。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

2004 《我的半生記：臺魂淚（一）》。臺北：楊翠華，再版。

顏杏如

2007 〈二つの正月：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時間の重層と交錯（1895-1930年）〉，《日本台湾学会報》9：1-21。

2009 〈植民地都市台北における日本人の生活文化：「空間」と「時間」における移植、変容〉。東京：日本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専攻博士論文。

Transition to Modern: New Year Celebration from Late Qing to Japan-Ruled Taiwan (1890-1945)

Yu-ju Lin

ABSTRACT

From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o mid-20th century, Taiwan changed from being a frontier province of the Qing Dynasty into a colony of Imperial Japan. Follow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vereignty and to strengthen its colonial rule, the Japan Empire imposed prevalent westernization on Taiwan, thus posing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of Taiwanese. Taking the new year celebration for instance, while Taiwanese had all along followed the lunar calendar and celebrated the Lunar New Year,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introduced the Gregorian New Year, which symbolized the modernity. Beside of difference in timing, the two new years were also distinct in their traditions and ceremonial observanc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how Taiwanese gradually adjusted or adapted to changes in new year celebration promoted and imposed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whether their strategies manifested a form or a spirit of resistance against colonial rule.

With references to diaries, newspapers and related literature from late Qing rule to 1945,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hanges in ways how Taiwanese celebrated new year, the transformation of festival observance in Taiwan,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ultural elements, as well as the background and reasons behind the preservation or abolition of cultural practices.

Keywords: Gregorian New Year, Lunar New Year, Abolition of Lunar New Year, Assimilation, Culture Resistance